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6月15日第12期 总第15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58期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研究专辑（三）

目 录

【专 稿】

赵惠中 北师大“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

附录一：伊林、涤西：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附录二：李文博：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附录三：张传亭书法作品

【述 往】

安希孟 不太平的北太平庄——北师大文革琐忆

黄大地 北师大头号“走资派”程今吾先生之死

【资 料】

王乃英 关于北京市文革初期活动的交代

韦 陀 北京师范大学1967年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附录：北京师大红卫兵小报简目（李晓航编录）

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1966.07.16）

李雪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1966.07.27）

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1966.07.27）

康生接见部分学校来访学生时的谈话（1966.07.28）

【读者来信】

1. 王伟赞 156期乔晞华的《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

2. 郑平平、刘葳谈《宇清谈画》

【本刊声明】

【专稿】

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

赵惠中

所谓“12月黑风”，指的是1966年12月发生在北京以给林彪提意见为主要内容的事件。但从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显示，此事件可以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伊林（刘握忠）、淅西（张立才）的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作为起点，到1966年12月中、下旬这批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全体被抓进牢房为终点，时间跨11月与12月两个月份，长度达一个多月之久。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仍沿用原来的称呼：“12月黑风”。从内容来看，不仅仅局限于对林彪一个人，而是还包括中央文革几名大人物，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等新思潮，所谓“黑风”其实不黑。

一、背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代表最高司令部向全国各界发出的动员令。

6月1日晚8点的例行全国新闻联播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文革”发动者后来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领衔署名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日，《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些接二连三的举动，吹响了将文革推向全国的进军号。几天之内，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搞文革，在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党委都被打成黑帮，无一幸免。昔日的校领导都成了走资派，

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较优秀的老师有的也被打倒，大多数是诚惶诚恐，普通教师也是人人自危。开批斗会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罚跪认罪等等悉数尽有。此时的刘少奇立即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试图让工作组控制局面，将运动纳入有序的轨道。但工作组的做法明显与最高当局掌控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宣传口径不一致。如北师大工作组提出“层层剥笋”、“抓游鱼”的口号等，模糊了运动的重点，敏感的学生就贴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把这部分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镇压。刘少奇搞的这一套实际上像1957年反右的延伸，这一招立即被毛泽东揪住不放，说刘少奇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群众运动。由此导致了刘少奇先受贬后倒台终丧命。1966年8月5日，我校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8月17日，政教系石磐教授在主楼七楼跳楼自杀身亡。社会上大搞破“四旧”，打、砸、枪、抄家成风，“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倍受打压，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取代了刘少奇，从原来的第六位跃升到了第二位，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从此以后，林彪成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全中国各种场合都必须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再加上一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组织机构方面，以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与部分政府机构，彻底打乱了原来正常运转的权力机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接受了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还对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全国第一轮的武斗和抄家狂潮，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及公安部门的支持和纵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段内“牛鬼蛇神”的名单和地址。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对武斗作了诠释：“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我校中文系刘盼遂教授及其夫人梁秋色等多人就是在此期间被迫害致死

的。这股狂潮从北京迅速蔓延至全国。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不久，在接见到首都串联的全国军事院校学员时，叶帅在讲话中还说：经医生检测和科学论证，表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以上，敬爱的林副统帅也可以活到120岁以上，他们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社会。

这一讲话内容被红卫兵们以“北京来电”的方式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以林彪讲话为标志，在众多党政头面人物的实际行动带领下，国人将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推到了狂热的极点。

在众人狂热的浪潮中，还是有不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并不盲从，他们在思索：这种现状正常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打破这“一边倒”狂热的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位高三学生刘握忠（伊林）和张立才（淩西）。他们于1966年11月15日上午七点左右，在清华大学贴出了一份《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在这大字报中，伊林、淩西对上述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详见附录一）。对于第四条“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后来被淩西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到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都给推翻了，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下去论毛泽东个人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

碰。这是涤西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

这封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就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后来又贴到北京大学。大字报被撕掉后，涤西感到事态严重了。他就一不做二不休，组织人印传单。并且还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八百份到一千份，他亲自推油碾子，不让别人动，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他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涤西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北京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也是传单。他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忠、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他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11月30日，北京林学院李洪山又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贴出一条“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12月1日上午9时，在北京串联的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中、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的学生和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的师生、林院部分工人与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进行了一次辩论会。

学生们问李洪山为什么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

李洪山说他的理由有三：

1. 根据十六条中的第九条，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起桥梁作用的。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十六条中，并没有讲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不经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因此，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2. 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乱发议论。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什么东西都要怀疑。现在北大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谋。

3. 中央文革制造分裂。10月6日三司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这是分裂的开始。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传单满天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哪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什么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不准拉横幅大标语，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呢。”

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与李洪山的巨幅标语虽然遭到了迎头痛击，但也获得了许多学校少部分同学的支持，给林彪与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大字报纷纷出现，北师大便是其中之一。

二、北师大的“12月黑风”

12月9日，中一（2）班的敦进田（林锋）、张传亭（向东彪）贴了一份题目是《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

中文系学生彭加瑾、王永敬在12月10日与12月12日，分别贴出了《我们也贴中央文革小组一张大字报》和《把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推向新阶段》两份大字报。

12月11日，物三（3）的刘中柱、杨以鸿贴了《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信》，物三（4）的李文博立即在此大字报上用钢笔签上了表示支持的评语。

12月13日，物三（3）的刘琢、李鸿杰、金宝英贴出了《中央文革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

12月15日，数二（1）班李世取（黑牛）张贴了《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大字报。后来他又接着贴了《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

因为不知道彭加瑾、王永敬、刘琢、李鸿杰、金宝英现在何处，也不清楚后来为什么对他们几个人没有重点打压，所以我写此文时没与他们五人联系。下面重点就谈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文博、李世取六人。

刘中柱和杨以鸿一开始就怀疑文化大革命。他们都不迷信权威，都希望生活在民主和科学的氛围中。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那时他们班正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劳动实习。当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们顿生疑窦，这样的文章是科学的吗？恰好他们班孙光启同学的舅舅李大可是中国戏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孙光启和他们一样怀疑这篇文章。由孙光启联系，他们三人拜访了李大可先生。可能由于戏剧研究院已经决定了方针政策，李大可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姚文元文章。刘中柱和杨以鸿与

李先生辩论了近三个小时，互相说服不了对方。1966年2月10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金宏达(时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的文章。

1966年12月，为躲开学校的嘈杂，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到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休息。当时刘中柱和杨以鸿对文化大革命已持否定态度，但没有表达的机会。依林和涤西的《公开信》给了他们机会。当时杨以鸿的观点为，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又加一个不能动的权威——林副统帅，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接受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是迫不得已的，决不能再来一个绝对权威。刘中柱的看法较为实际。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民主就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不等于反对。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和科学，将不可能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见视作反对，进而视作反革命，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较量一下。本质上他们的大字报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目标是事件——文化大革命，至于大字报的对象具体是哪个人，并不重要。那时候对林彪个人，并无特别恶感，只不过认为，他的一些讲话，不像话，不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领袖而已。

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工人宿舍讨论。他们在大字报中强调：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断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大字报由刘中柱起草、杨以鸿誊写、李观韶检查。当时已考虑到风险，所以只有刘中柱和杨以鸿署名。李观韶不署名，万一出事后李观韶留在外面可作些照应的工作。大字报底稿由李观韶保存。此大字报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由刘中柱、杨以鸿、李观韶三人一起带回学校贴出的，贴了后又返回工厂。

12月17日凌晨三时，谭厚兰就派手下人把他们两人从工厂揪回学校的小红楼看管起来，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亭和敦进田。当晚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12月18日，外语系的董连猛又把他们四人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他们四人押送专政机构了。李观韶后来参加了井冈山造反兵团。

敦进田、张传亭写的公开信是一份油印小字报，贴在大字报栏里。内容可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以较大的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很怕落下反林罪名；后半部分以较小篇幅说明：即便伊林、涤西的观点有错，也不应该把这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他们的大字报暂不评论，仅从他们的笔名来看，“林锋”就是从林杰、关锋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向东彪”即向着毛泽东与林彪，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马上就有人在他们的笔名上大做文章，说“林锋”、“向东彪”的含意就是像树（林）的（锋）芒指（向）毛泽（东）和林（彪），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世取，重庆市人，平民“红五类”家庭出身，父亲是工人。当时为数学系二（1）班学生，平时用功于专业学习，时间抓得非常紧，业余喜好看些小说，间或也看点历史、政论之类的闲书。

1966年10月底，他与其班上十多名同学响应“中央文革”等关于学生串联可用“步行”方式，以更好地接触工农大众的号召，组织“长征队”，计划由北京步行到延安，途经“平型关”、“大寨”，沿途接受革命传统教育。11月中旬，“长征队”抵达太原小住之际，正逢中央下达要求学生们返校“复课闹革命”的紧急通知，他与陈木法就迫不及待地脱离大队，乘拥挤不堪的火车连夜返回了北京，其他同学则不顾中央的通知，照原定计划继续步行串联，最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1967年元旦后方返回北京。

返回北京后，他与陈木法往西单、王府井等旧书店买回了不少数学专业书籍，为“复课”做了些扎实的准备。但当时像他们那样响应中央号召及时返校的学生并不多，整个校园还是冷冷清清的，课肯定一时半会也复不起来。于是，他俩自我规定：半天自学专业知识，半天关心“文化大革命”。

从李世取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看到：回校的半个多月，他回顾了“文革”开展近半年来的历程及“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感到“文革”存在许多问题，如“打击面”过大，各地“乱批乱斗”现象严重，“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不能落实，被批判者的人身安

全得不到保障，人格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工农业生产全面受损，对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而1964年、1965年才真正复苏、好转的国民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且因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击日寇之地)和山西沿途(包括平型关地区)都见到老百姓的生活仍很困苦(连基本口粮都非常少)，教育都还非常落后，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是连基础都没有的；觉得国家本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教育，更担忧照当时“文革”的趋势发展，搞不好很可能让全国百姓再经历一次“困难时期”。

于是，回北京“半天关心文革”的十多天里，经过反复考虑，他首先给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康(生)老”写了一封信(通过邮局寄出)，信的署名是真名。据说他当时并不想出风头，只是希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们多了解一些社会实际情况，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步行串联中沿途的观感，表述了自己的忧虑，就关于如何“更健康”地开展“文革”提出了自己个人的“几点建议”，核心内容是希望在“文革”中“中央文革”能够引导群众“历史地、全面地评价干部”，要“加强领导”，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落实”，“对乱斗人、乱打人的”无政府、无法纪现象一定要制止，对工农业生产一定不能放松，而学校、学生长期停课带来的长远损失也许是无法弥补的，也应重视。

12月初，北师大已有学生张贴出给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后，他首先张贴了一张谈自己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认识的大字报——《必须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署名“黑牛”。大字报强调：既然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那么，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对国家领导人的善意意见和提醒都是合法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不能打击、迫害给林副统帅提意见的人。依据大字报内容来看，这些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人更是完全出自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对他们更不能打击、迫害。

接着，黑牛将其给“康老”所写信的内容转抄成两张大字报公开张贴，题目是《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公开信——几点意见和建议》，署名也是“黑牛”。

黑牛的大字报张贴出来后，一直没有受到批判，反倒有若干人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下支持的意见。

12月17日清晨，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被谭厚兰抓起来的消息在北师大校园内传开，在他们张贴的大字报旁新张贴出一些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多为口号“打倒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林锋、向东彪、杨以鸿、刘中柱！”“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罪该万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同时还新贴有大字报和标语，称“坚决支持、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正告：“反对中央文革者绝无好下场！”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校园内的空气一时格外凝重。

这一天，原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张贴过大字报的学生中有立即表态转变立场的，也有“反戈一击”，立即揭发杨以鸿还有其他“反动言论”等等。而唯独不见黑牛有新动静！在同学们都以为黑牛会就此收手并立即做出“检查”的时候，他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18日下午，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沉默寡言了一天多的黑牛反倒张贴出一张题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话》的大字报。大字报首先为林锋、向东彪和杨以鸿、刘中柱等辩白，(大意)称这些同学都是“文革”初期的热心参与者(其中的林锋、向东彪曾为“红卫兵”)，他们大字报的内容并无对林副统帅的恶意攻击，而对林副统帅讲话中的“顶峰论”、“天才论”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公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表现的是勇于探索真理的赤子之心，不能说有罪。又说，“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对已经开展的“文革”做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是真正关心“文革”的人应尽的责任等等。记得该大字报的结尾大意是：我自知张贴出这张大字报的后果，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真理和真相也在召唤我，……。别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别了，这段时间与我在一起踢球的小朋友们！别了，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引来围观！

据说，黑牛在张贴完大字报后即往理发店先理发，再往澡堂洗澡，吃了晚饭后回到宿舍收拾好换洗的衣物和《毛选》等书籍，不到九点即安然入睡。

后来听说，黑牛吃过晚饭回到宿舍时，一位素不相识的教育系同学曾急匆匆地敲开他的房门，劝告他说：黑牛，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我希望你马上去将自己的大字报撤下来，并立即做出检讨。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的努力是没有用的……。但黑牛没有听取这位同学的劝告。

黑牛被拘捕那天的凌晨，在同班同学的带领下，学校治保会的工作人员来到黑牛的宿舍，门开灯亮，黑牛醒来，睁开双眼看清来人后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是来带我走的吧？”得到肯定答复后，黑牛从容穿好衣服，抱起放在床头的衣物、背上书包，在治保会人员和同学的“护送”下来到治保会，那里有公安局的同志正等着他……

据说，他在书写完最后一张大字报后还给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写了信，信中感谢了父母的养育之恩，请父母原谅他的不孝，并请哥哥代自己尽孝。

李世取当时的表现有些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后来批判他时，多次问他：其“黑牛”的化名是不是“黑帮、牛鬼蛇神”的缩写，你是不是要代表“黑帮牛鬼蛇神”出来说话？他的回答是：自己的乳名就是黑牛，且他长在南方的农村，从小知道南方的水牛（皮毛都是黑色的——黑牛）是很能吃苦耐劳而又是有大脾气的，这点很像自己，因而写大字报都用黑牛为笔名。

林锋、向东彪、刘中柱、杨以鸿四人在写大字报之前都将自己的观点做过宣传，与人讨论过，因而他们“东窗事发”后连带一些同学也要做“深刻检查”，搞得十分紧张。唯有这位黑牛独往独来，写出那几张大字报之前，不与同班的任何一位在校同学商量、交流，特别回避与陈木法接触，后来“交代”说都是自己一个人躲在阴冷无人的大教室里写的，所以也没有哪一位同学因他的大字报受牵连。特别该强调的是，陈木法没有受到黑牛的任何牵连，后来思想上远离“文革”运动，坚持偷偷自学，且借用黑牛买回的旧书，提前自

学了研究生的有关基础课程，78年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后被送美国深造，学成归国报效祖国，2000年后成为我国的科学院院士。

李文博是物理系三（4）班的学生，虽然他在“12月黑风”中没有直接贴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只是在贴林彪的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但他是被抓进拘留所六人中的重犯。他是12月19日被押送进拘留所的，因其罪行“重”，关押的“号子”都与另五人不同。李文博的罪“重”在何处呢？早在1966年10月17日李文博贴出了《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大字报（详见附录2），此大字报当时在北师大反响不是最大，只是说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但因他在大字报中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响极大。伊林、涤西他们把他与北京大学的乔兼武（在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并列称为“新思潮”的“祖师爷”，说他们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由此可见，北师大还是此“黑风”的源头之一。

我班隋文淑同学回忆说：“李文博与我是东北老乡，66年12月，北师大大部分同学都外出串联了，校内人较少。我记得在师大主楼碰到他，他告诉我，他准备贴大字报，并给我看了，我记得标题是‘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看完后，我劝阻他，不要贴了，贴出去肯定要被抓的，他把帽子摘下来给我看，我一看头发已剃光，他似乎已准备好被抓。可我当时却很害怕，劝他还是不要贴，很替他担心！第二天就听说他被抓了，据说大字报贴在北航那边。”

对他们六位当事人，面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对北师大富有正义感的群众来说，也是一片白色恐怖。王福亮，1966年底是学校播音员，是敦进田、张传亭的同班同学。他播音时，心里想着敦进田、张传亭怎么会成反革命了？一走神，本是要喊“打倒林锋、向东彪！”的，结果却喊成了“打倒林彪！”，幸好他出身好，才躲过一劫。物二（3）的杨怀志看到了伊林、涤西和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就在大字报边上参与了对这些大字报

的议论，与不少在校同学一样，也认为“林可批评”。后来就有人揭发他炮打林彪。好在没写大字报，最后不了了之。

综合观察“12月黑风”，可以看到：

1. 从伊林、涤西大字报到北师大刘中柱等人的大字报，语言极其温和，内容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向林彪和中央文革提意见、谈建议。体现的是忧国忧民，是赤子之心。但是却因言获罪，被打成“反革命”，饱尝了牢狱之灾。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法律被粗暴践踏。公理何在？

2. 这些大字报在当时已经涉及到反对“个人崇拜”，要民主、要言论自由，提出了民众可以罢免官吏等等，这些问题在50年后的今天仍是禁区，可见他们的政治眼光远大。

3. 他们贴大字报的时间是1966年年底，对像是林彪、中央文革。风险之大人人皆知。但他们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

4. 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担当，即使身陷囹圄仍然尽可能保护他人，所以像李观韶、孙光启、陈木法等都没受牵连，真是难能可贵。

三、拘留所

约在1966年12月中旬，江青接见首都红卫兵时说：，现在有一股黑风（即十二月黑风），有一小撮反动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林副统帅。指出要揪出这股黑风的黑后台。12月18日，谭厚兰的手下先将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四人押送到公安部（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东），旋即再押送到半步桥（陶然亭西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很快，李文博与李世取也被抓进北京市看守所。12月22日是李世取的生日，他的21周岁的生日是在拘留所内渡过的。

据刘中柱回忆：

12月18日夜，我们四个人被送到北京市看守所。当时我正发烧，晕乎乎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大概分别登记了姓名，将兜里的所有东西拿出来，由警察登记保管。然后给一床被子，两个盆子一双筷子，送到一间拘留室。第一夜室内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太累了，我裹着被子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杨以鸿他们被送到什么地方。第二天早上，看守敲门叫醒，各室依次洗漱，从门上小窗，才看到杨以鸿、敦进田和张传亭关在同一巷子不同室。敦进田在邻室，杨以鸿和张传亭在对面。早饭后，两个警察依次进各室，向我们宣布，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谢富治的命令，拘留我们，并要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大概这是他们意料中的态度，二话没说，他们收起拘留证转身就离开拘留室，并“咔嚓”锁上门。拘留的生活正式开始了。

拘留室的号子，面积约为3×3平方米。门向走廊。门上一窗户，一尺见方，从外面挂一白布。看守掀开白布，可观测室内的被拘留人员。门对面墙下由约一寸厚的木板拼接，从左墙到右墙成一整张床，类似于日本人喜欢的榻榻米，离地约20厘米。被拘留人员坐睡均在床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床板已被磨得光可鉴人。床上一小炕桌，供犯人写材料。门对面墙上有一宽一米，高60厘米的窗户，窗子朝外开，窗户上有铁棍的栅栏。我站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的一部分地方。屋顶中央有一盏电灯，灯泡为铁丝网包围，防止犯人卸下来。大概拘留所也是头一回遇到关进来如此多的学生，也搞不明白按什么规则来管理这些学生，只好采用“大概差不多”的办法。按拘留所规矩，被拘留人员在室内平时应端坐在床上反省。我们则不管那一套，想躺就躺，想坐就坐，看守们也不管。我们常常掀开门上窗户的布帘子，伸头到走廊，和其它室的难友聊天。多的时候，每个号子的门上伸出一个脑袋，整个走廊上像开会一样。有时候看守觉得太过分，吆喝一声，大家缩回头去。不一会，头又陆续伸了出来。一直到1967年一月风暴，政法公社夺了权，管理才逐渐紧起来。拘留所将布帘撤去，换成缩拉门。门外面有一小拉手，看守可以从外面拉开小门以观察室内。但室内人员仍然从里面拨开门，将头伸出去。管理人员最后只好在门上订上钉子，让缩拉门只能打开3、4厘米宽的一条缝，这才杜绝各室间伸出头的聊天。

拘留所内的伙食标准刚开始为月 11.5 元，粮食日九两。早上一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粥，一点咸菜，中午两个窝头，一碗煮白菜，里面几个豆渣兼豆腐丸子，晚餐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一个星期有两次在中餐的菜中有几片肥肉。知识分子讲面子，头一两天都还装作无所谓，在走廊聊天的时候都不提伙食。几天后到底熬不住，叫嚷下一顿饭快来。在 1967 年 1 月 13 日《公安六条》公布后，伙食标准下降，改三餐为两餐，每天“八两窝窝头”。这个低标准的伙食让李世取得了慢性胃炎，后来此病一直折磨着他，2015 年 3 月 27 日还发生了胃穿孔，不得已做了胃部手术。

宣布被拘留以后，好几天都没人理。只见不断有学生被送入。开始是我们贴林彪的大字报的学生，包括北师大学生，北京农大附中的伊林、涤西，北航学生，北大的学生。然后是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的学生，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的学生。后来是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中学生，工人纠察队的工人。后来进来了赫赫有名的谭力夫。实在搞不清为什么要将他也抓进来，大概根据“政治就是平衡的艺术”吧。以后将李井泉的两个儿子李黎风与李明清抓进来了，他们都住在贺龙家。他们自己就公开说，抓他们是为了榨取对贺龙不利的材料。老大李黎风是清华的，老二李明清是北航的。以后回学校，老二被北航“红旗”打死了。其实将这些人放到一起，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这些人都不会真正地承认错误。纵然这些人可能在政治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对于将他们抓捕这样的处置极为反感。将他们集合以后，产生心理上相互支持的效应，从而制造了一个大大的对立面。几天后，开始第一次审问。我被带到一个审讯室，室内两个警察，主持审问的那位，约五十岁。大概觉得对付我是游刃有余，在这个过程始终保持着微笑。这一次主要询问我们写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特别关注是否有后台支持。询问结束以后，让我看了笔录。当我表示无误后，在笔录上按上手印。然后要求我回号子，将整个过程详细写出来。为此，给了我一些纸和笔。以后这些纸都派上了其它用场，如写菜谱，作象棋围棋，扑克牌等等。又过七八天，又提审一次。这一次简单问了几个细节后，就聊起天来。显然，所有的情节非常简单，对于这些审案的老手，实在是索然无味，让他们打不起精神。

所以像混日子一样，连笔录都没有，一会儿就打发我回号子了。一月风暴后，又提审过一次。这次换人了，有一个愣头青，大概是政法公社的吧。当时，《公安六条》已经颁布，他们尚方宝剑在手，又是革命派，于是指责我们攻击敬爱的林副主席，如何反动。无论说得如何热闹，但始终不说究竟要把我们怎么样，就放我回号子了。后来一想，他们无非是过把瘾，想表现一下他们的存在。从此，就没有人再过问我们。到1967年4月中旬某日，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的头头们从预审室回来，告诉大家，已经决定放他们回去，只需写一个二百字的检查即可。同时，他们说，预审员告诉他们，这大概是毛主席接见一些(被打垮了的)干部子弟时作出的决定。我们估计离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远了。当时的基本想法，先出去再说。约两个月后，我们被分别带到预审室，通知我们写二百字的检查。两天后，又被叫到预审室，对我们说：你们被学校送来的(他们忘了曾让我们在拘留证上签名)，学校现在接你们回去(将抓我们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我问，我们算什么？回答，以后不要再出事了(不明不白，让你自己想去)。于是，便结束了拘留所的生活，被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接回学校。这里面一些微妙的环节，革委会的人好像都不太理会，当时他们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看出这里面的眼高眉低，没看出公安局已经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可能革委会有个别人已体会到这里还有一点奥妙，但仍然不管不顾地折腾我们。不过当他们覆灭的时候，这些都是小罪恶了

据李世取介绍，李文博因“罪”重，与伊林、涤西等关在另一号子里。他和敦进田、张传亭、刘中柱、杨以鸿被拘留审查时是关在同一个大号子里的。起初关他的那间在杨以鸿、刘中柱的斜对门。李世取说：我的隔壁先住过谭力夫（他的对联我是反对的，曾与同学一道往北京工业大学找过他，本想与他辩一辩的，可惜他带队下乡支农去了，没想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了邻居）。见到的谭力夫实为一白面书生，待人彬彬有礼，其人全无读其“对联”和讲话稿让人感觉到的那股“杀气”。他被移走后，住进去的是李井泉之长子李黎风，不久他也被移走。后来，我被转到1号房与敦进田、张传亭在一室，这间屋上午能见到阳光，较原来那间暖和许多。这里每天接近中午时都能听到有脚镣在地上拖行发出的

异响，过一阵又能听到回来的声音。一次我好奇地爬到窗上往外看，看见的是一个带脚镣的人被两个人拖着往外走，被拖的人个子不矮，但很瘦很瘦，闭着眼。这令我很是震惊。不久，听说这人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也是被拘留的，因为绝食，但监管者绝不能让其饿死，就每天拖着 he 到一个医务室那边用管子插到胃里，强行给他进食玉米面粥。真是残酷！此间负责审查他们的人员对他们还是很讲政策的，没有出现“逼供信”之类的事情。在他们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错误，并重点查清了他们“身后”并无“黑手”操纵、支持（没有刘、邓线上“组织”的“黑手”）。查清“有无幕后黑手”，这应该是“拘留审查”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是查了几个月，发现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很多还是“红五类”子女，写大字报都是自发行为，与“刘邓司令部”毫无牵连，跟“联动”绝对是两码事，于是在1967年5月29日上午被解除拘留。

四、修建科劳改队

1967年5月29日上午，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从半步桥看守所回校。回校后立即被各自班上专政小组的人带回本系或本班接受批斗，李文博还挨揍了，李世取被“坐喷气式”。

几天后，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再加一个陈宝殿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刘中柱被送到事物科苗圃劳动。修建科劳改队形成了。先后入修建科劳改队的共有16个学生，两位干部共18人。管理劳改队的开始是较年轻的付师傅和王师傅，不久换为年老的冯师傅，冯师傅一直管理到“劳改队”解散。

这16个学生与两位干部分别是：

第一批都是学生共7人：

1. 陈宝殿：河北人，谭厚兰班党支部书记。由于和谭厚兰们的矛盾，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调干生，入大学前当过小学校长。他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认为我们这些人才是真

正的反革命。因此觉得和我们劳动，太冤了，丢了他的面子。整天闷闷不乐，并不断将修建科里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向上面不知道什么人汇报。但修建科的冯师傅等一直护着这些小反革命们，使他们得不到他认为应得到的惩罚，因此更加闷闷不乐。1967年底，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以后一直不知其消息。

2. 杨以鸿：物理系三（3）班学生，江西南昌人。

3. 刘中柱：物理系三（3）班学生。湖南长沙人。

4. 敦进田，中文系一（2）班学生，河北人，大字报署名“林峰”。

5. 张传亭：中文系一（2）班学生，安徽阜阳人，大字报署名“向东彪”。从署名看，这二位表示他们至少是尊敬毛泽东和林彪的。

6. 李文博，物理系三（4）班学生，黑龙江佳木斯人。

7. 李世取，数学系二（1）班学生，四川重庆人，典型的四川娃儿。不苟言笑。除非他自己想笑，他人休想逗得他笑。

以后陆续送到修建科劳动的有两位干部和九名学生。

两位干部是：

1. 于陆琳：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夫人。北京地下党员，被认为是彭真、刘仁黑帮集团成员。也不知怎么就被送到修建科劳动了。修建科给这些反革命腾出一两开间的房子休息。于陆琳的主要工作是打扫这间房子。由于经历过多次党内运动，她对这些小反革命的前途并不持太悲观的态度，视他们为一群小顽童，和他们有说有笑，并不时泄露出一点点她们上层妇女间的一些流言蜚语，引得大家瞠目结舌。不多久，她被叫回系里。

2. 浦安修：彭德怀元帅夫人，曾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文革前是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

于陆琳和浦安修两位前辈年龄也不算小了（于陆琳小一些），又是女的，只能安排在修建科内给一两个师傅打下手。当时于陆琳的丈夫钟赤兵将军还没有被打倒，所以于的日

子相对好过一些，浦安修因为彭德怀元帅的问题，她的心理压力较于陆琳大许多。其境遇更令人唏嘘

一次，她们两人都挨了斗，原因是修建科一位与她们一起劳动的工人师傅家里生活困难，接受了她们的些许粮票和很少量钱物资助，被人揭发，说她们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工人阶级，逃避改造。

后来，师大开大会斗争彭德怀，将浦安修拉去陪斗，使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和摧残。

九位学生分别是：

1. 王文×、2. 孟繁树：中文系五年级学生，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五年级的学生见多识广，不知道采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没有被送到修建科来。他们只是在后来才被送到修建科来，但呆了不长的时间，就到沙城农场。孟繁树后来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王文×不知去向。

3. 方义奎：外语系俄四学生，湖北新洲人。在平常的言语中偶然出现对毛主席不敬，兼与井冈山公社成员矛盾公开化，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虽然专业为俄语，但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唐诗联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刘中柱就是从他那里听到并记得的。需要具有高格调的人，才能从《唐诗三百首》中，找到这首诗，并体会到这首诗的美。他虽然不是伟丈夫，但却是一位情圣，一直记得某人。他脾气平和，但毕竟是九头鸟一个，在极端情况中会露出男儿本色，特别是遇到川娃子的时候。某次，他与李世取一言不合，便要动手。好在当时有其他人在旁（没有其他人时是否会发生这一幕，则不知），被劝开。但以后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到湖北大冶程潮高中，文革后也考取了研究生。

4. 杜哲森：中文系一（3）班学生，天津市北郊（现北辰区）人。因对文革持抵触情绪，写有大量所谓的“反动诗篇”和“反动日记”及题为《师大反革命何其多也》的大字报。1967年3月被检举揭发，在班、系、校召开了批斗会后，按北京市公安局意见接受“群众专政”。

因不堪忍受被囚禁宿舍的孤寂生活，在知道“修建科劳改队”后，就主动加入了这个学生劳改队。此公酷爱绘画。平日劳动毕，即回修建科，在从各处搜集的纸上作画。利用周日到北京图书馆借阅图书（学校已经吊销了他的借书证）。做了不少有关美学、绘画史论的笔记。

5. 张国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湖北武汉人，老家河南，因此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是一个快活人。自感钢笔字和毛笔字均上不了台面，于是突然决心练习毛笔字。虽有宏大志向，但实行起来太不专业，只在报纸上练习写字。不巧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照片，被井冈山公社成员发现，于是成为趋近于反革命。如果对于一个平素老实的人，可能就放在群众中监督就行了（其实那样更难受些）。但他素喜社会活动，与造反兵团头头铁崇光同班，并过从太密，被疑为其军师，便由趋近于反革命，一下子被视作真正的反革命，送到修建科劳动了。能够在修建科当反革命，他日子反而更快活了。

6. 张梅英：政教系三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后成为杨以鸿夫人。1968年分配到陕西陇县工作。

7. 许永康：物理系二（3）班学生，新加坡华侨。解放初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肄业参军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又以调干生身份于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因学习吃力，留级到物二（3）班。他是被一系列的“疑似”送到修建科的，此足以证明谭厚兰们管理之没谱。他被疑似为五七年的漏划右派，疑似为五九年的漏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串联中的照片中的背景有桥梁，又被疑似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等等。其实，谭厚兰们要惩治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造反兵团的活跃分子。这么个“老家伙”还要造反，很令人生气，于是索性让他当反革命去。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无重大建筑任务，修建科的日常工作为小的修修补补。通常出工时，是开工一袋烟，工作一个小时又一袋烟，再工作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家。因此，抽烟是获得额外的休息的必要条件。当时，其他学生赖父母供养，只能买些碎烟叶来卷大炮筒以解馋。老许有工资，可以抽二角几的纸烟。每到工地，他差

不多给每人发一根纸烟。抽烟过后，大家干活去了，他便在一旁继续抽烟，一直到收工时候。这些人脑子活络，总能找到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老许年龄大，大家嫌他碍手碍脚，也乐得抽他一颗烟，让他在一边呆着。这么安逸的日子，老许却受不了，便以一种传奇性的动作离开修建科。在张国钧和李文博的掩护下，他偷跑离开了学校。他的这一动作惊动了一些正苦于没事干的人，物二（3）班邵先亮们便进入修建科追查，并带走张国钧和李文博。张国钧和李文博回修建科时，已脸青鼻肿。大约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老许在修建科里的日太好过了，所以当他被抓回来以后，就不准他再回修建科。他不被当反革命后，热衷于焊半导体收音机。看到他可以将收音机焊得那么小巧精致，大家直感叹，还是术业有专攻呀。

8. 赵鸿尚：教育系二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当过三年解放军。他的主要军事技能是烧饭，因为当的是炊事兵。也是由于对毛主席不敬的言语并同时对抗井冈山公社而被送至修建科。他有一句名言：“抓紧时间偷懒！”这句话在表面的玩世不恭之下蕴藏着丰富的哲理，让人终生受用。他也是一个快活人，除了睡觉和喝醉了，总是笑嘻嘻的。他的到来给修建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大家打他会做饭的主意。几经交涉，他终于答应主持做饭。大家将干活时收集的废纸卖了几块钱，买了三斤多肉和一瓶白酒。我在伙食科劳动过，便去“拿”一些大葱和白菜。从工人师傅处借来厨具，便由赵鸿尚张罗做将起来。十来个人为这三斤肉忙得热火朝天，令不远处劳动的干部和教师们好不羡慕。数学系老师郝炳昕评价说：“当人有信念的时候真是毫不畏惧的！”赵鸿尚后来分配回老家，在聊城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9. 顾孝悌：不久就被抓。

另外，当时学校还有一个“干部、教工劳改队”，像数学系的王树仁书记、中文系的启功教授和黄药眠教授、李长之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孙煜等等都在其中，他们有时也会到修建科“劳改”。他们干的主要是一些轻活。

“劳改队”的这些学生们，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后即到队部报到，“天天读”一个小时之

后，就在师傅的带领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有时冯师傅会与他们一同劳作，有时只负责分派劳动任务，并非时时刻刻“监督”他们，所以，一天里他们最为愉快的就是劳动的时候），夜里则回到各自的学生宿舍报到、睡觉。

除此而外，他们中有的人还曾被“勒令”每天清晨清扫楼道和厕所的卫生。

专政小组要求他们每周至少写一次思想汇报和检查，负责任的专政小组组长会不时对他们训训话。

“劳改”的过程中他们遇到过老者避人耳目的温馨问候和祝福，偶尔也遭遇过不明事理的“红小兵”的追打。

总的说，他们感觉自己已经沦为“贱民”。

虽说带队的冯师傅很是关照，但这些被“劳改”的学生们干的还是常有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三九天在气温零下十多摄氏度的整个夜晚抢修冻爆的水管；最冷的日子衣着单薄站在敞篷卡车上郊外拉木料，以致于下车时人已迈不开步子；用大马驾辕的平板车人力拉很重的木料、砖块和水泥板等。平时，修缮队所有的“小工活”和泥瓦工、架子工、水工、钳工、锅炉工之类各种零七碎八的杂活他们都干过。可说他们的足迹遍及北师大的每一个角落，化学系所在的老校区及附近的生活区、西单那里的教工住宅区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由于没有经验和缺乏具体指导，他们遭受工伤的事也时有发生，扭伤腰腿是常事，有的手指骨折也不止一次（后来，杨以鸿又在房山“石化总厂”的基建工程中接受“再教育”时被巨石压断两根手指；李世取在石景山高井火力发电站接受“再教育”时手指再次负伤）。

下面是发生在“学生劳改队”的二三事：

1. 杨以鸿、刘中柱等惨遭“大游斗”

1968年的暑期，师大掌权的“井冈山”红卫兵和与之对立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的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之时，为了打击当时被困在“工五楼”内的“造反兵团”，将他们宣传为学校“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井冈山”的决策层祭出一招：先在“牛鬼蛇神”中寻找

“兵团”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选出来后再集中在“工五楼”前搞一次大游斗。

先是“井冈山”派人到“学生劳改队”开会，让每人都对“井冈山”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斗争表态。当时“劳改队”中的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们早已远离了校内的运动，对“井冈山”与“造反兵团”之间的那些是是非非知之甚少，所以他们的表态多是模棱两可，总的还是希望两派团结合作。

接下，有的系还专派人到“劳改队”背靠背找有关学生个别讯问，问某某在平时是否和“造反兵团”有联系或是否有支持、同情“造反兵团”的言论。其实，平素的“劳改”中，大家都很是自觉地不谈时下的政治，即便闲谈，对校内的事更是很少涉及，这种背靠背的揭发想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但是，他们中仍有人在劫难逃。

后来，确定被抓到“工五楼”前大游斗的学生牛鬼蛇神是物理系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和数学系的张国钧……。

为什么是他们？虽说李文博因一张《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全校知名，但那是1966年底的事情了。可是因“井冈山”的大字报一直在批判“造反兵团”奉行的是无政府主义，说李文博的《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说在思想根源上“兵团”与李文博本是一丘之貉。数学系的张国钧原本也是“造反兵团”的同路人，而刘中柱与杨以鸿的好友李观韶也是兵团的。据说那天在“工五楼”前被游斗的牛鬼蛇神很多，场面也很是惨烈。刘中柱和杨以鸿的脖子被用铅丝吊上大筐勒着，筐里装有砖头，分量不轻，遭拳打脚踢地游斗下来，他们的脖颈都被勒出了很深的血印。男儿有泪不轻弹，“出事”后从未流过泪的杨以鸿被释放回来，一入劳改队队部就禁不住泪如雨下；刘中柱本是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中身体最为强壮，也是平时最乐观的，六尺高的汉子回来也是泪水滂沱，黯然神伤……。

这是修建科劳改队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

2. 奇特的“白专道路”

杨以鸿与刘中柱本来就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虽然在劳改队中异常艰苦，但仍坚持走“白

专道路”。杨以鸿原来是学俄语的，但在劳改队中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当时物理系的“摘帽右派”刘辽老师也在接受劳改，刘老师是专门搞相对论研究的，他们俩就偷偷地向刘辽老师学习相对论。负责监管他们的工人师傅在得知他们学习的情况后不但不阻止，反而暗中保护他们，后来还设法为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充当他们的学习场所。在他们的带动下，数学系的李世取也悄悄地复习起功课，并自学俄语版的“概率论”教材等。中文系的敦进田和张传亭拜启功为师，醉心求教书法习字。中文系的杜哲森则潜心学习素描绘画……

十年动乱结束，杨以鸿、刘中柱、李世取顺应时代感召，先后考取各自专业的研究生，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施展能力，杜哲森以中文系学生之资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生，后来自成为独具风格的田园昆虫画一派；张传亭和敦进田后来也都有自己的书法成就，当与他们在“劳改队”的这段经历有直接关联。

3. 逆境中的“爱情之花”

张梅英是“劳改队”中唯一的女性学生，是个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张梅英通过与杨以鸿的几次偶然接触，发现这个已经沦为“阶下囚”的年轻人并没有悲观，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他仍然坚持学习专业知识，坚信凭着自己的双手总是可以挣饭吃，坚信只要自己在一门事业上能够成功，总会得到社会承认的。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最后演变成爱情。杨以鸿与张梅英都是68届的，68年12月份，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张梅英因为问题没“升级”，被如期分到陕西陇县工作，杨以鸿因仍是“反动学生”被延期分配。张梅英在告别时提醒杨以鸿：“我如果去了以后要永远当农民，你也要做好将来一辈子靠工分吃饭的思想准备”。得到了杨以鸿的肯定答复后，双方的恋爱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张梅英因走之时，杨以鸿去向尚不明，她到了陇县后写给杨以鸿的第一封情书、第二封情书都是先寄到李世取那里，再由李世取转传给杨以鸿的。1970年，这对患难之交的年轻人终于结婚成家。这也是“劳改队”中的一段佳话。

1968年八月至九月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校内主政，派别争斗而致乱纷纷的局面渐渐平息。随着各项“斗、批、改”工作慢慢步入正轨，也可能得益于运动初期“学生问题一律不整”的“文革十六条”吧，到1969年三月至四月间，“学生劳改队”终于解散了。

五、结局

劳改队解散后，中文系的敦进田、张传亭、杜哲森和数学系的李世取都回到各自的班级继续接受教育；63级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张国钧因“延期分配”分别到本系低一年级的班上继续接受教育。虽然班内的同学大多数都比较温和，但一有“好事”，例如要抽少数人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高井热电厂、房山县“北京石化总厂”（当时称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的建筑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合适人选”。杨以鸿就是在“东炼”劳动时被压断了两节手指头。因为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还在台上，那顶“反革命”的帽子始终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印证了刘中柱、杨以鸿“当五年反革命”的正确。按理来说，“12月黑风”的当事人个个都是英雄，但是为了说明伟大领袖一贯“洞察一切”、“永远正确”，军宣队、工宣队的代表分别找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谈过话，总的是要他们端正态度，要正确认识“九·一三事件”。大意是：林彪后来出事不说明你们早先就对了……关于你们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事情组织上以后不会再提，“你自己也不要说当初你如何如何正确”等等，大耍流氓腔。1972年4月，所有的64、65级学生被扫地出门，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也跟着一起被分配。当时他们提出：我们是68届的，早就该分配了，我们现在刚被分配，用人单位一定要问个为什么？所以希望工宣队能把我们当时写的大字报放在我们档案中，用人单位看了我们的档案就一目了然了。对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要求，工宣队就是不答应。还说什么，66年12月林彪是副主席，你们那时反对他还是错的。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

两年后，北师大党委才正式给他们平了反，才肯定他们当时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还补发了扣发的工资。

刘中柱后来考上了北师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引力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1990年以来，从事光纤使用孤立子进行通讯的理论研究，分析在改变光纤的参数时，光孤立子可能发生的改变以及对于通讯过程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参加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十篇，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同时，研究具易磁化面的自旋链的朗道—栗夫席兹方程，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这个方程的孤立子解的解析表达式。这个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同时还发表与此有关的论文四篇。后来又从事毫微米距离的引力—Casimir力的研究，发表论文两篇。还从事声致发光现象的理论研究，在《物理化学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两篇，并从事有关检验光子静止质量实验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物理评论》等杂志发表有关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放大，以及交通堵塞问题等复杂系统性质的研究论文十篇，均为SCI收录。

杨以鸿 1980年考取首届C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太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色心物理”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上领先地位。但他谢绝了美方的高薪聘用，重回北师大任教。但因他在文革中长期遭受打压，经常借酒浇愁伤及肝脏，于1987年身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1988年2月3日午夜逝世，终年41岁，英年早逝。为了纪念杨以鸿，北师大1988年7月1日出版的《师大周报》用整整四个版面，以“专号”的形式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详细介绍了杨以鸿不平凡的一生。

李文博后来被分配回原籍佳木斯，任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后升级为佳木斯师院，现为佳木斯大学）教师。1980年代调入北京印刷学院，1997年转到北方交通大学（原北京铁道学院）任教。他是研究生导师，我班一位同学的女儿就是他带的研究生。我班有一同学在深夜跟他打电话，他还没有回家，仍在实验室做实验。1989年他参加了民主运动。遗憾的是，李文博已在2006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世取 1979 年 9 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0 年 12 月被选举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 年 11 月，分配至郑州原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工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多次获奖，其中突出的有 1997 年获总参某部技术工作突出贡献奖并获政府特殊津贴，2002 年、2006 年两次被评为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1983 年以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20 多篇，专著《密码学中的逻辑函数》于 2002 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2003 年 1 月由北京中软电子出版社出版；专著《密码学中的有关概率模型》于 2004 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和电子信息科技专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2005 年 11 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编写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课教材《测度论——概率论基础》2006 年由信息工程学院出版。

敦进田曾任河北省深泽县师范学校校长，后任辛集市一中高级教师，退休前在深泽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张传亭曾任中学副校长；退休前任中共阜阳市颍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书法家协会会员，阜阳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阜阳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阜阳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见附录 3：张传亭的书法作品）。2014 年，他撰写的回忆启功先生的十篇文章，曾连载于《中国文物报·鉴赏周刊》。

杜哲森于 1978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任职于学报《美术研究》编辑部，兼史论系专业写作与画论教学，历任副主编、编审、史论系教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致力于美术史论研究、中国画创作及古体诗词写作。主要论著有《元代绘画史》、《中国传统绘画史纲：画脉文心两征录》、《四画僧的人生与艺术》、《道家意识与文人书画》、《七言论画》诗稿（未出版）及文人画专论和当代美术评论。绘画作品出版有《孩提梦》画集。

老华侨许永康已于 2000 年逝世。物二（3）班的同学十分怀念他，在 2010 年许永康逝世十周年时，特地制作了一个《怀念亡友许永康专辑》（PPT）。他们在专辑中写道：先生一生坎坷，尽管满腔热血爱国，却屡次无端挨整。文革中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住过

“牛棚”。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1991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几天后被驱逐出境，从此客居香港，2000年在香港去世，享年70岁。

邪恶压不服真理，金子一定会闪光。阶级斗争害煞人，唯民主自由是正道。■

2016.04.12于上海

作者说明：

1. 本文得到了文中主人公刘中柱、李世取、张传亭、敦进田大力支持。许多史实都经过他们核实，特在此向他们致谢！刘中柱2009年写的许多资料，是教育系64级学生郭文涛（电视连续剧《刘少奇过渭水》的编剧）精心保存下来的，谢谢郭文涛！

2. 陈闯创先生为我提供了1966年12月19日的北师大《井冈山》小报等历史资料，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样向他致谢！

3. 因为离当时快达50年了，有些时间等细节，当事人的回忆都不一致。后商定以1966年12月19日北师大《井冈山》报提供的时间为准。本人发在《记忆》150期上的《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中与此有冲突的以本文为准。

4. 因文革后停课了，无级可升。文中表述的年级、班级均为1966年6月份时的班级称呼。

5. 因时隔太久，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当年的大字报目前尚未找到。他们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都经当事人认可。尤其可惜的是，保存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的李观韶已于今年1月15日不幸病逝，寻找此份大字报的重要途径就此中断。现在文革的亲历者多数已过世，在世者最小的都已过花甲之年，抢救文革资料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大家共同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吧！

附录一：

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伊林、涂西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到：“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

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

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都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

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录二：

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李文博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批、改”。这里的“改”是指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触及人们的灵魂，形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思想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新制度。

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领导机构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器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社会基础。……

由于领导机关仍然沿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方式（或者经过了某种改组），因此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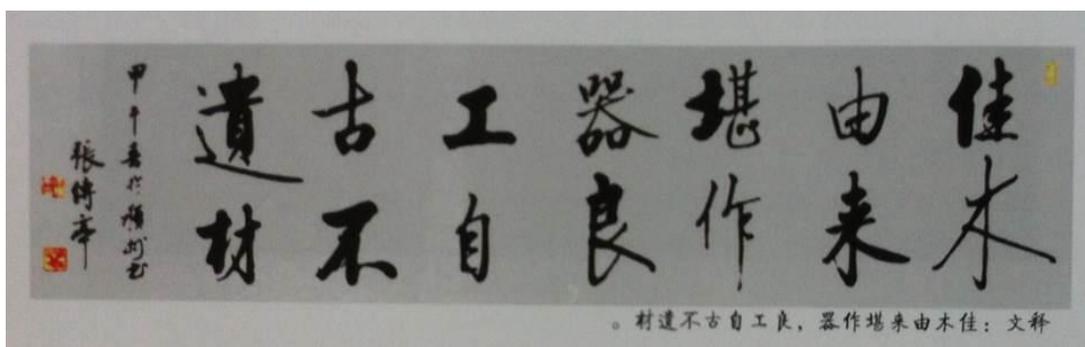
的社会实践是在社会思想下进行的。

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马克思说：公社虽然被搞垮了，但它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无产阶级实现公社原则之前，它将一直大喊大叫。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 ■

附录三：

张传亭书法作品



【述 往】

不太平的北太平庄

——北师大文革琐忆

安希孟

一、文革北师大若干事件琐忆

文革开打未几，我们的老师陈达星不无善意地提醒我们：57年反右，西北楼大字报也曾经铺天盖地，但后来还是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我们不信他的话，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而，秋后算账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但那是几年以后的1969年秋后。

我们班的蹇明理同学1965年入学查出肝炎，休学回家。我们从别人的大字报得到启发，就揭发系领导迫害工农子弟。不过谁也不认得领导，就把系秘书周泽兰拉出来大声呵斥，让周泽兰站在文史楼台阶上“竖起狗耳朵听着”。王永琴同学在缝纫组做了件衣服，也贴大字报说家属服务缝纫组加工费太贵。啊，怎么也造劳动人民的反呢？这和资本主义有嘛关系？黎浩智老师被学生揪斗，因为他们哥仨分别叫智、仁、勇，据说是蒋介石提倡的。学生用厕所铁丝纸篓制成高帽给他戴上。好像铁丝划破了脸。胡敏，系总支秘书，高年级给他撰对联讽刺，大意是：小胡敏正步走得得意洋洋。后来破四旧，一年级二班的袁景龙、陈金国等同学嫌“师范”二字讨厌，把北师大改为“教育革命大学”，把校门口校牌抬回来，贴上“中国教育革命大学”几个字。但我觉着不如外语学院改成“世界革命大学”神气。

1966年6月的一天傍晚，彩霞满天，忽然“毛主席万岁”响彻北师大校园——以七机部副部长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奉北京市新市委委派进驻北师大。众生热泪汨汨如泉涌，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不知那是刘少奇司令部派来的消防队）。孙友渔站在主楼阳台上向满含热泪的我们招手致意。他雪白衬衫外套毛背心，风度潇洒。没娘的孩子又有了娘。

工作组进校后，宣布“内外有别”，先在图书馆二层大阅览室开辟大字报区，铁丝纵横交错，大字报飘飘然，揭露程今吾、谢芳春、石森、马建民。我们都渴望大字报能揭发惊人的反革命滔天大罪。然而很失望。依稀记得程今吾是延安小学（高干子弟）校长，有《延安一小学》著作。谢芳春原为广西省委党校校长，他只有关于“两论”的辅导文章供挑刺；石森是解放军总参干部，为了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到北师大做政治部主任，“三结合”进革委，讲话语无伦次，被戏称为“老阿斗”。马建民是作家杨沫的夫婿，《青春之歌》中的样板人物。“三结合”干部，水平也不咋地。我对于黑帮没有像样的可供批判上纲上线鸡蛋里挑骨头的文章，恨恨不已——总得抓住几个“三家村”才过瘾呀！

工作组在主楼八楼大会议室召开批判旧党委走资派大会，神神秘秘，校园冷冷清清，一片死寂。我辈非党团员游离于运动之外，只有少数党团员参加批判。我自幼因政治原因一向自卑，自己个儿归类为落后分子。在主楼批判党委书记大会，学生代表出席，我班是董连猛与焉有份。有几次大中小会议报告，规定团员才可参加，全校设分会场联播。系里党团员开会，我班六位团外人士，单独学习讨论。好像在非党团员中，我又成了地位较高的——我是主持学习讨论的召集人。校园冷清凄凉。真如伟大领袖说的，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文革伊始，北京市委改组，以李雪峰、吴德为首的新市委取彭真、刘仁的旧北京市委而代之。北师大遂有热血青年张贴大字报，砸烂旧党委，认为以前加入的是反革命黑帮集团彭真的修正主义党团组织，遂宣布自即日起退出党组织，重新申请加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此声明甫出，即群起而攻之：你宣布退党，就是叛党。那几个“退党者”吓得腿肚子筛糠，赶忙谢罪。好在各级党组织瘫痪，不再过组织生活，也不缴纳党费了，没有书记副书记管辖，人自为战了。

后来我研究基督教历史，知道，基督徒一旦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不管给你施洗的牧师、神父成为异端，叛教者，还是腐败分子，那洗礼都有效，无须二次受洗。因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水是圣水，圣灵在起作用。只要手续完备，在组织程序上，你就是合法合理

的基督徒。同样，那个党组织可能垮了，属于黑帮、旧北京市委，但你在宣誓时，马克思的英灵就注入你的灵魂里。你加入的，还是以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文革前夜，我被本班团支部通过发展新团员，但没有扶正，还没有履行手续，还没有宣誓就职就天下大乱，神州陆沉。我从此永久性地成为无党派人士。1971年北师大吐故纳新恢复党团组织生活，效率太低，也还是没有履行手续成为团员。我到银川六中当学生班主任，学生入团得经我手，我不好意思。学校书记说，班主任是受党的委托。我这才挺起腰杆。

有一天，北师大文史楼108教室忽然人声鼎沸，人们一窝蜂涌去。原来高年级有几个出身不好的非党团员，平时政治表现又差的人也想乘机造反（人家党内内斗，你激动神马）。高年级党员干部以风卷残云之势揪斗之。批判大会主旨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对高年级学生和一部分老师颇觉陌生——他们刚从山西武乡四清一线撤退回校。主持斗争大会的高年级一位党员大哥哥大概是肝癌，带病上阵，腹部抵顶讲桌桌角，脸上气色不佳，但极具斗争口才和组织才干，成功揪出几个翻天的“游鱼”——据说有一位右派学生，其舅父在台湾，是国民党军官。这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后来据说孙友渔执行的是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市委又派了国家物价局局长刘卓甫到师大。刘卓甫不像孙友渔风度翩翩。1966年7月27日，中央文革一干人马光临。大会上中文系王兰怒斥刘卓甫执行了一条“没有孙友渔的孙友渔路线”。江青喝令刘卓甫站在一边，他乖乖低头。

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袖章偏窄，毛体红卫兵仨黄字偏小，且正上方有一颗五星。师大井冈山战歌来自电影《碧海丹心》的插曲《钢一连连歌》：“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来自南昌城下，我们来自湘江两岸，为了红色政权，和白匪军决一死战。”

此组织的战地歌曲还有《雄伟的井冈山》：“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

东。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转危为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一泽一东。”1967年“五一”或国庆，北师大和北大在天安门广场是邻居，打派仗，对歌互骂，对口快板，三句半，山东柳琴。把北大打败了。北师大表演“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叠罗汉的文宣队搭人梯排成山岳，手指北大方阵。北师大井冈山每次开会还集体放歌“井冈山之歌”：“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断。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那一九二七年，他把人民的枷锁打烂，带领着红军上了山，你是革命的摇篮。啊啊啊啊啊啊。”

1966年11月下旬，北农大附中高三学生伊林(本姓刘)、涤西(本姓张)张贴《致林副统帅的一封公开信》。12月初，北师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杨以鸿、刘中柱张贴《也致林副统帅的一封公开信》。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林锋(本姓敦)、卫东彪(本姓张)也贴出给林彪“提意见”的大字报。该校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张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清华、北大、中科技大也有给林彪提意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大字报出现。

对林彪的“意见”，主要是反对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的说辞，认为“顶峰”论割断历史，否认马列主义继续发展，不符合辩证法，认为“天才论”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动力的唯物史观，是“英雄造时势，伟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伊林、涤西、杨以鸿、刘中柱的大字报言辞激烈，“警告”“敬爱的林副统帅，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历史的辩证法又是公正的……我们不愿看到有一天历史的辩证法之鞭落到您身上”！

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则主要是针对乱批乱斗造成的混乱，称若发展下去，社会生产和生活必将遭受更大损失，建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等领导机构照党的政策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有力措施，予以矫正”，将“文革”引向正确轨道。

忠言逆耳，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学生遭到镇压。1966年12月中下旬，他们被“拘留审查”。在查清他们“身后”并无“黑手”操纵后，1967年6、7月间他们被解除拘留，回校接受“专政改造”，编入“学生劳改队”。1969年8月，完全解除“劳改”，是团员的恢复组织生活。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工军宣队说：林彪自取灭亡，并不意味着你们当初就正确。这件事情今后组织上不再说了，你们自己也不要再说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1978年，他们最终得到“平反”。伊林于1978年考取人民大学，杨以鸿1978年考取杨振宁的研究生，赴美留学，学成归国。但终因“劳改”落下的病根，于1988年病逝，年仅41岁。

北师大外语系另有一个方义奎，名不见经传，1966年12月因为攻击林副主席遭遇批斗关押，据说精神失常。我们的历次政治斗争标准不断改变，今是而昨非，朝令而夕改，但当其时也，罪名和罪行都很吓人，过后一风吹，整人者，轻轻拍屁股走人，然而在被整者，被批斗被关押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失去的却是全部，甚至生命。

北师大井冈山带头造反事迹主要有：造孔庙的反，反“二月逆流”，造大庆、大寨展览的反，武汉支持造反派，火烧英代办，“揪刘火线”。

1967年3月，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的地盘窃取动向，掌控中央各部对李先念、陈毅的意见，反击“二月逆流”搞的一个组织。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我当时血气方刚，觉得周总理和李先念比较右，希望真的能发现有关他们的大字报。青年人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结，希望别人倒霉。肉食者利用人性的弱点从中渔利。

我在中央各部调查组结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李富华、李兴华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么还有大学生研究宗教。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是否必须持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内部窃取情报。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过学点宗教，又知道同在一个调查组的人观点不尽相同，也有维护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他们后来也分成两派。就是当年真造反的“联队”朋友，他们后来也切齿痛恨后面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可是又怎

么可以怪罪于他们几个书生呢！我因了这点滴社会科学知识，后来就报考了南大宗教研究生，拿基督教学理言说社会问题！

清查“五一六”时，分到东北的同学所在学校觉着这位同学反对过李先念，于是千里迢迢来北京外调。我没有捏造，也没诬陷，外调的人说我不老实，“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就火儿了。蒋亨俊老师——她落难时我帮助过的——说我态度不好。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怜悯别人。

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后的1967年春天，系革委会成立，俄四李保全是系主任。我们年级也成立文革小组领导班子。一个班出一个人任年级文革小组成员。我们班，一年级一班，我和王尔德、刘泽英是大家选出的文革小组成员。我的意见是让刘泽英去年级小组，但刘泽英不和我们商量，就把自己个儿报上去，惹得我生气了。我提出，谁进年级小组得大家选举。果然大家同意我去，杀了她的威风。可我还是让她去了，因为我不愿意和那几个不熟悉的牛头马面在一起。我和陌生人说话就拘谨。其实，我和刘泽英是好朋友，就因为她和年级那几个人走得近，我们彼此观点有异，才疏远了。不过尽管在井冈山里我属于异议人士，但我俩私交不错。我住医院她常去看，她后来嫁给了北大毕业的搞原子弹的。

1966年红八月，夏日炎炎，女生穿短裤不穿裙子，开口闭口“他妈的”、“操”（现在叫“靠”，Cow）。到批斗台上踢打牛鬼蛇神，是革命的表现。说句实话，女孩子内向羞怯，其实是一种美。大呼小叫，不好。疯狂的行为，最好让我们这等粗人干。

1966年盛夏，人民日报记者碰到我班美女王崇义。王说自己是“崇拜毛泽东主义”的崇义。“你叫我小王吧”。后来传开，大家戏谑地叫她“小王八”。王崇义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叫北师大革委会宣传队（脱胎于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舞蹈动作大体是右臂抱拳横胸前，左臂后甩，前腿弓，后腿蹬，作横眉怒目状，口中念念豪言壮词。或其余三肢同，右手下指，目光如炬，怒斥刘邓。右臂斜劈，表示横扫。右臂抬起作仰视状，即望见北斗怀念伟人。要是砸烂狗头，就杏眼圆睁，纤纤玉手握重拳砸下。每次香汗涔涔，锻炼了身体。

红八月，“红色恐怖”。一位“狗崽子”汤运昌，写大字报改名“毛为民”。同班女同学不让他革命：“你也配姓毛？”站到凳子上，用扫把顶住一张沾满浆糊的破纸，上面写“狗崽子汤运昌”，要盖住“毛为民”。大字报底下许多“跟贴”，都是糟蹋他。其实，汤姓出自成汤，即商朝的开国君主。这是贵族呀。运昌，多好的名字，鸿运昌盛。那时候，我老是自责：祖宗为嘛不拉一根打狗棍讨饭！且常为旧社会家里不穷而懊恼。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内部的南北两派是这样的：井冈山的元老们，大多是有思想有见识的敏感的一批优秀学子，他们自觉造反，最先组建井冈山战斗团。但1966年冬井冈山内部大辩论大分化。最早的井冈山战士最有思想。有保姆的左派谭厚兰不能容忍他们比自己更有能力。他们退出后组建了井冈山造反兵团。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叫井冈山，因为当初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就是他们始作其俑。谭厚兰上山后翦除王伦王佐们火并他们，董连猛当初还在伪红卫兵师任军职。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等井冈山“元老们”被赶下山，只好另立井冈山造反兵团。没有退出的，就是后来的南派基底。即使如此，井冈山内部依然有一批“元老”不满于谭厚兰的无能。一般人心目中谭厚兰并非才华横溢，只是事先得到内部小道消息，奉辞伐罪（奉辞伐罪，指奉严正之辞而讨有罪。《书·大禹谟》：“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伐，一作“罚”）。师大最早造反的有为青年中不乏才智志士。1967年春，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前后，井冈山二度分裂，大字报中心区南北两面各有一份声明，分别形成南派和北派。南派是反对派。这一派1967年冬延伸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多么奇特的名称，一个松散的小团伙。我是这一派的。发起人中文系张梦阳先生，如今是鲁迅研究达人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井冈山内部的反对派，便具雏形。谭厚兰的革委会内部有了分歧和对立面，给善于钻营的某些人以可乘之机。1967年9月，王力、关锋、林杰倒台，革委会再度分裂。樊、黄、李三位常委身陷囹圄。此时革委会剩下谭厚兰、董连猛，石森，马建民，曾照耀等。樊、黄、李在德胜门看守所吃八两窝头（当时的调侃用语）。

工军宣队清查“五一六”，外语系刘月英仅仅因为不拥护工宣队就成了牺牲品（刘月

英死得惨烈，见《记忆》第150期）。刘月英，山东女子，后来和兵团观点一致。

据数学系卫小慧的见证，1971年在北师大校医院住院时，一天，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还是隔壁那个可爱的刘月英，又拄着拐杖在楼道里顽强地练习走步。刘月英喘着粗气，靠在卫小慧病房的门框上。她摔得非常惨，骨盆粉碎性骨折，虽然做了手术，痛苦减轻了许多，但下肢神经已不可修复，整个下半身就像拨浪鼓一样甩动着。卫小慧真想去搀扶一下，可她又不敢去。刘月英后面跟着两个人，像押解犯人似地监视着，不允许她和别人接触，不允许别人和她说话。她不光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自由。怎么会这么残忍。刘月英放下一只拐杖，把一绺搭在眼前的头发拨到耳后，原来红润、稚嫩的脸上，现在几乎没有了血色。几步路就折磨得她上气不接下气。听说分到江苏的同学上午都走了，其中就有她的男朋友丁锋(道升)。也许刘月英不想拖累男友，让他轻轻松松走了。可她今后怎么过呢？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人人羡慕的新党员，当初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四·二六，就这样毁灭了一个风华正茂的人生。这个重大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想到这里，卫小慧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只见刘月英拄着拐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想迈出一只腿，然而腿却不听使唤。这一步步走向康复之路是多么艰难。她练啊，练啊，然而汗水仍然难以换来想象的效果。校医院只留下她坚韧不拔的身影。后来她父亲接她回家，几年后她拖着残疾的身子到师大讨个说法，最终在师大绿园地下室一间房子里孤独地结束了她宝贵的一生。

未经省查的人生没有价值。顾后方能瞻前。人贵有自知之明。国君若无自知之明，就会使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彻底反思才是摆脱厄运的不二法门。文革的参与者如我们，千万别落入一贯正确的雷区。我们是受害者，但也被裹挟，恶作剧加害于人。我们自己绝非可怜而无害。文革回忆的最大误区，是认为罪错都在人家，唯独自己蒙冤受屈，或唯独自己一贯正确，后来可怜兮兮。别人是真正反党反革命，他人受难是罪有应得，唯独自己丹心向阳，似乎即使自己落井下石，也是响应伟大号召。我们所受到的最大伤害并非我们曾经成为阶下囚，而在我们趾高气扬手执钢鞭“得令得令”将你打。当我们激昂慷慨，不可一世之时，我们的灵魂最苍白无力，最被玷污。 ■

【述 往】

北师大头号“走资派”程今吾先生之死

黄大地

1957年反右后，北师大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何锡麟被认为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调离。由财政部副部长老革命刘墉如任党委书记。刘身体不好，从1960年起由副书记马建民代理主持工作。1963年，全国出现了所谓的“右倾回潮”，中宣部调陆定一的干将程今吾来师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程今吾年轻有为，到任后大刀阔斧，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对纠正极左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恢复右派教授讲课带研究生等，同时也就引起了极左分子的仇恨。文革开始后，程今吾也就自然首当其冲成了北师大的头号“走资派”，一天到晚对他没完没了地批斗，打骂，羞辱，但程先生很淡定，一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的样子。

家父黄药眠是57年的大右派，也在“牛鬼蛇神”之列，频遭批斗。但与程先生比起来，他已处于陪斗的地位。我当时是中学生，学校停课，所以总在师大校园里转悠，含有暗中保护家父的意味，常看到一群小孩子打骂挂着黑帮牌子的程先生。但程先生都以平和的心态挺过来了。可到1970年初，突然听说程今吾死了，怎么死的，是自杀？疾病？还是被逼供打死的？大家都讳莫如深。直到2011年，我见到当时跟程今吾关在一个“牛棚”的化学系学生右派徐光华老人，他透露了真情：很简单，就是想让他死，但又不好做得太露骨，就想了一个办法：在“牛棚”外搭了个狗窝，三九寒天的叫程今吾爬进去睡，说像你这样的走资派连牛棚都不配住，只能去住狗窝，把程先生活活冻死了。早上一看没气了，就找来辆车把人抬走了。

听了徐老的讲述，我就想，哪来这么大仇恨啊！后来一查，原来程今吾也是国统区的，早年是陶行知的学生和崇拜者。抗战时他在桂林是个文艺青年，后来加入中共到了延安。

据我研究，文革就是解放区的整国统区的，也即苏区党整白区党。就是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有感情，对新民主主义比较认同，所以把他们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而痛下杀手。

（参见拙作《黄药眠的跌宕人生》）。到1970年时文革已进入中后期，这些所谓的走资派已到了等着做结论安排工作了。偏偏这时许多老干部反倒都莫名其妙地死了，如当年国统区的中共干部，著名记者范长江、陈同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突然死亡的。我感觉这些人的非正常死亡，并非偶然现象，很可能是造反派接到了中央文革的秘密旨意，将这些人不动声色地处死，以绝后患。而不大可能是各单位的工宣队、军代表杀害的。对于一点，还有待当事人能勇敢地站出来加以证明。 ■

2016、4、6

【资料】

关于北京市文革初期活动的交代

王乃英

编者说明：王乃英，女，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干部，林杰（《红旗》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编辑）之妻。文革初在北京“四清”工作干部大会参加运动，后奉调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工作，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在政治组工作。1967年8月底林杰被隔离审查后受牵连，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本文是她在1968年初接受审查期间写的个人文革大事记。在1968年2月1日写此材料时，王力、关锋、林杰已被揪出，故直呼其名，而戚本禹于1968年1月14日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她尚未得知，故仍称其为“同志”。

这份资料是瑞典文革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的。现据原稿扫描件录入。此稿是残件，开头即“1968年2月1日”，且其中个别人名难以辨认，录入者谨以◆代替。文中个别地方略加了简注。

（渔歌子录入、编辑、注释）

主要活动大事记（二稿）

（1966.7—1967.9）

1968年2月1日

五、关于北京两大派问题

在革委会期间，我对办公室和周围的一些同志散布过一系列对北大、北航、清华的看法。其中一部分对革委会外的孟宪浩、齐士昌、曹◆散布过。其主要内容如下：

“聂元梓是老佛爷，咱惹不起。”

“聂元梓上食堂卖饺子，王光美还上食堂卖饭呢。主要看执行哪条路线。”

““新北大”公社在聂元梓、孙蓬一操纵下，分裂中央文革，讲自己是江青派，炮打谢副总理，攻击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是联动的黑后台，对外支持保守派，到处伸手，一夜之间到八个中央部夺权，支持高司、产业军，教育部的北京公社等。对内压制民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校内根本没搞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却将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一起拉到斗鬼台上去斗。聂元梓与陶铸、王任重不是一般关系，当彭小蒙揭发出来后，她就要组织斗争彭小蒙。”

“聂元梓是野心家，树立个人威信。在校内展览会上自己的像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多。记者统计后提出，她才增加了几幅主席的像片。‘五月春雷’是树立个人威信，就差喊万岁岁了，可她上台接见，与演员一一握手，听着演员高喊向聂元梓同志学习而得意洋洋。在纪念‘五二五’时准备印聂元梓半身像。在校内零派贴大字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校文革却说是别有用心，是反聂元梓。太没道理了。”

““新北大”公社不像其他学校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中杀出来的。他们的红卫兵成立的很晚，运动以来，几个关键时刻，聂元梓的表态是有问题的。陈必陶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反工作组，聂元梓是反对的。红卫兵大串连开始，聂元梓是不赞成的。”

“聂元梓在华北局问题上是与中央唱对台戏的。死揪李雪峰，说李雪峰是三反分子。中央派李雪峰去天津，他们去人追到天津，并在那里搞绝食。这中央是发文件点名的。中央又派李雪峰去内蒙，他们又追到内蒙。她姐姐是华北局的，姐夫是黑帮。这有什么关系？”

“聂元梓到处揪叛徒，是借搞一人问题，搞垮一个组织，要不她为什么不揪她的叛徒哥哥聂真？”“她是什么红卫兵，她是什么小将？她家是地主，还要打扮成革命地主，哥哥是叛徒、三反分子，姐姐、姐夫也有问题。她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第二个丈夫是黑帮。她自己在北京饭店是作了检查，给彭真写了信，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五天内就向党委检查了三次。”

“聂元梓政治上不老实，扣下地院广播车一两个月，还假惺惺地说，我们本想第二天就带队送去，但怕引起误会，所以才没送。气得王大宾说不出话来。”

“在两派矛盾缓和时，我讲过，聂元梓是不会甘心的，不根治，脓包不在这里长，就在那里生，北京还是要乱一阵子。”

“王大宾、谭厚兰是出身贫农家庭，就比较老老实实，和干部家庭出身的蒯大富、韩爱晶就不一样。蒯大富、韩爱晶就会耍小聪明，见风使舵。韩爱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最突出，蒯大富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最突出。他们原来都是保院（校）党委的，后来，蒯大富对聂元梓是有看法，而且矛盾很大。后因校内矛盾让聂元梓拉了过去。蒯大富是忘恩负义。最困难的时候，康老支持他，反过来又反康老。还不承认，将责任往下推。”

“北航很多干部没站出来。”

“清华大学李琴珠之死（李琴珠是清华大学女学生，1967年因个人感情挫折卧轨自杀。死后才知其已有身孕，但男友是谁没人知道。由此出现一些流言，但因无确切证据，相信的人很少）。有人怀疑与蒯大富有关。”

“革委会、中央都有文件不许打、砸、抢，不要再串连了，可常委（指韩爱晶等人）带头到批陶联委会，开着十几辆大卡车，打着大旗去打砸抢，不请假，就到外地去。应该在常委会上检查。”

“为什么韩爱晶去河南不久，河南就出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标语？为什么他这时候要去外地，办事组应该让他马上回来。”

“北大校文革是什么权力机构，外边也不承认。里边也不承认。他们要问我对北大校文革怎样看，我就说，我不了解，我没有调查研究，我相信北大的革命造反派会有正确的结论。”

“北京两大派，绝非是一般的派别斗争，这是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不能调和、妥协。”

北大、北航搞北京日报时，我讲过：“这就是搞革命委员会。北京日报是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他们却讲北京日报是反革命的喉舌，那革命委员会又是什么了？”

这些话，引起了听者对北大、聂元梓的不满，加深了两大派的分裂，破坏了北京市的革命大联合。■

【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 1967 年大事记

（征求意见稿）¹

韦陀

一月

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师大红卫兵批判孔子的文章。

1月16日，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北师大“井冈山”、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组织支持下夺权。而同时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亦进驻北京日报社，与报社内的另一对立组织结合，宣布夺权，并控制了印刷厂，自行编发报纸。对立的双方

¹ 因从立新已有《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一文，本大事记除必要者，不再收录相关资料。

相互指责。经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北京日报》停刊。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2月5日撤离该社。

1月18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反派代表，高校红卫兵代表列席会议。周恩来讲“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北京市的一些综合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夺权当中要下大力量（引自北大《动态报》）1月19日）。北大与北师大在支持高教部哪一派夺权一事上发生了分歧。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吴传启和《红旗》杂志林杰的支持下，支持教育部“北京公社”的卢正义夺权。““新北大””反对卢正义夺权，理由是卢正义在历史上曾经叛变自首，并出卖过同志。““新北大””等高校到达高教部后首先夺了权。谭厚兰、卢正义带领几百人反夺权，打了北大学生，发生了冲突。关锋、王力打电话给聂元梓、孙蓬一，严厉批评了““新北大””。于是聂元梓带领北大学生撤出了教育部的夺权活动。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发表了“中立宣言”，也撤出了教育部夺权。1月，在师大夺权后的“井冈山公社”与其他学校的造反组织一道，到《北京日报》、粮食部等处联合夺权。

1月26日，“井冈山造反兵团”成立。李庆林为“总勤务员”。郑云云、王颂平、赵德骏和蒲寿章为“勤务员”。此后，王颂平率领一些同学到校外调查。谭厚兰的“井冈山”打压造反兵团，视其为保守组织。经常在高音喇叭中攻击造反兵团。

1月27日，北大、清华、地院、师大及北京市工矿企业200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公社，并发出紧急倡议，提出：“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力。”

△1月中，北大、清华、地院、北航等校的造反组织到北京市委夺权，“至于谭厚兰和一帮搞理论的笔杆子，在北京饭店设个机构，筹备夺权，不声不响，为日后市革委会成立后掌实权在谋划。”（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页210）

△1月，在师大夺权后的“井冈山公社”与其他学校的造反组织一道，到《北京日报》、

粮食部等处联合夺权。

二月

2月4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晚上审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京师大“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等红卫兵协助下重新录制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双片。江青、康生提出在影片中加上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的镜头，把吴德的镜头拿掉。江青还提出，元帅的镜头太长了，应该剪短些。随后，他们又看了文革前拍摄的“毒草影片”《横扫五气》、《在激流中》、《诗人杜甫》，边看边作了一些批判。新影厂舒世俊等做了情况汇报。

2月13日，陈里宁报告其受迫害经过，谭厚兰讲话，“井冈山”整训，号召社外群众参加。

2月14日晚，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五十名学生(受聘为《红旗》杂志通讯员)谈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都要靠他们，但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去做。毛主席的这条路线是和王明路线相对立的，王明对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打倒、推倒，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又说：你们是经过挑选的，但还要在斗争中考验。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联合、大夺权。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夺权中只要有一个领导干部参加就说是保守派，是错误的。《红旗》第三期社论中原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主席指示，后半句不要了。”

2月20日晚，在北饭厅召开全校大会，谭厚兰传达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王力的讲话。

2月19日，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钢一连”、“井冈山之声”、“挺进大队”等战斗队联合举行了“彻底批判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会”。决定成立“彻底批判无政府

主义思潮联络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指责该校的所谓“新思潮”派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并与之进行了“原则”的斗争。二月下旬，“井冈山公社”发出通知，决定总结批判“新思潮”的收获并进行军训，用毛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指导，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来整训自己的队伍，声称要使之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所谓“新思潮”，其内容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破坏大联合，打倒一切权威组织。”

2月21日，下午在北饭厅召开批斗肖望东、熊复、何伟、钱信忠四人大会。晚在北饭厅召开“革命干部站出来座谈会”。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社论强调：“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社论号召广大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社论发表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强烈反响，北师大一些党委委员表态亮相。地院各系都成立了由学生、教师、干部组成的革委会。师院、体院、北航、北医、石油等院校革命组织也纷纷举行干部座谈会。

2月23日，“井冈山”召开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晚上有文工团演出。

2月下旬，北京军区炮五师作为军训团进驻北师大，按班、系搞军训，支持以谭厚兰为代表的革命左派。李庆林等人组织的“造反兵团”解散，大多数人回班。

三月

3月7日，师大“井冈山”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最最紧急呼吁”，发誓“我们要揪出谭震林！因为他是镇压农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目前农口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头号干将！”同日，校内贴出批判谭震林的大标语，发表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

动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8日，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大会揭发、控诉了谭震林炮制大毒草——大寨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掀起“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井冈山”认为“造反兵团是‘二月逆流’的产物”，要“揪出造反兵团的黑后台！”

3月9日—10日，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与谢胡、卡博、巴卢库的谈话。陈伯达在会上揭露从1962年以来刘少奇“反毛主席的罪行”。“当前的斗争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3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师大分别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大会”。下午，谢富治副总理等同志详细地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师大“井冈山”战士的汇报。表示一定把谭震林的罪行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

3月11日，数学系铁崇光、马丽华、沈复兴、丁青元，物理系的刁士元，天文系的侯业勤、夏晓阳，体育系的李国元，历史系的杜桂龙，中四的年光瀛及中二（2）班的王颂平等10多人在主楼520开会，王颂平发言，分析校内外形势，指出谭厚兰讨孔功不可没，反“二月逆流”大方向正确，冲在最前面。我们不能当阻力。还提到学部的潘梓年、吴传启，粮食部的卢正义，民委的洪涛有历史问题，是谭厚兰那派的。王颂平提出解散兵团，大家同意。“井冈山造反兵团”，从1月26日成立，到3月12日被迫解散，仅“活”了46天。“井冈山公社”发表文章《喜看“冰团”哗流水》，讥笑兵团“跪着造反”。

3月13日，民研所洪涛等人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是日，师大“井冈山”战士与水产部内部革命造反派配合，援助在“二月逆流”中被冲散的“水产红旗”。下午，北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学部联队”、“北石北京公社”在北师大召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师大校内贴出许多“火烧

余秋里”“炮轰余秋里”等大标语，此后，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革命组织也纷纷“炮轰余秋里”。石油部大部分组织未表态，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

3月16日，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声讨谭震林的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代表发言。

3月17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有一百三十四各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

3月20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八十多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谭震林的反革命复辟罪行。

3月24日，晨，苏东海等人贴出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师大各战斗队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日，清华大学张灯结彩，红旗飘舞，在主楼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庆祝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等几十个单位赶来祝贺。是日下午，谭厚兰代表“井冈山”公社在北师大做检查。

3月25日，师大出现“苏东海等人炮打周总理罪责难逃”“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四月

4月1日，《红旗》第五期发表姚文元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

4月3日，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接见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革命派代表。会上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3月

27日对部分老红卫兵的讲话完全是“联动”观点。学校的左派不能解散，军训人员必须支持左派。提班级大联合是错误的，必须是革命的大联合。

4月11日，民族宫事件继续发酵。地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大。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煽动同学砸了宣传车，打伤了前去宣传的人员，发生了“4.11”流血事件。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任主任。北京红卫兵代表聂元梓任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李冬民任常委。

4月28日晚，“井冈山”公社举行了公社常委、公社委员、各大队长、指导员全体会议，通过协商，同意由原常委吸收革命领导干部二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4月29日，下午召开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谭厚兰为主任，原师大党委副书记马建民为副主任，造反兵团被迫解散。同时，校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宣告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党、政、财、文各项大权，从即日起，归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暂由三十三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领导干部两名，民兵代表一名，学生二十二名，教师五名，工人三名。公布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谭厚兰

副主任：石森、董连猛、曾昭耀

常委：石森、马建民、谭厚兰、董连猛、李五全、樊立耀、周耀文、邵忠诚、曾昭耀、黄贵贤、李少明

委员：李志德、武汉、林晓芒、周耀文、段惠芳、李桂芳、樊立耀、淦家森、李焕景、贺乔奇、张纪兰、董连猛、李五全、李革、江华生、李克臣、黄家林、叶林生、谭厚兰、邵忠诚、申家兴、周树志、黄福林、何文魁、吕俊清、石森、马建民、李坤德、李少明、黄贵贤、曾昭耀、刘继岳、王炳照

4月30日，下午全校大会批斗陆定一、彭真、程今吾、吴子牧、李维汉、徐冰。

△4月 以造反兵团为主体的北京高校造反学生猛烈“炮轰谢富治”轰动了北京市。谭厚兰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学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的口号。

△4月 文化部“联络站”与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等51个单位发起，在地院学院大操场召开“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展览》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131个单位、3.5万多人参加。

△4月 《人民日报》发表北师大“井冈山”中文系大队井冈潮战斗队的《“文明斗争”的反动实质——批判影片〈燎原〉》，北京电影学院滕飞明的《反动影片〈燎原〉必须彻底批判》，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文艺轻骑兵的《〈燎原〉篡改历史的罪责难逃》。

△4月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及《中国青年报》群众组织代表，协调各组织关系。李说：二胡（胡耀邦、胡克实）是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 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召开的军管代表会议上讲话：由傅崇碧领导的北京支左、军管工作有成绩，也有的地方支右了，甚至有镇压左派，把左派头头抓起来，其中包括北大、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抓他们就是犯罪行为。军队支左错误原因：一是认识不清；二是立场问题，思想上右倾。有的是受老婆、孩子的影响。老婆就是当权派，自己也是地方的常委，孩子是保守派，因此站在刘邓一边。

△4月 北京红代会开会，首次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4月 北师大等73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誓师大会。”

△4月 北京市中等学校开始实行军训，原拟要求按班级实行大联合，然两派斗争依然激烈。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中学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生拥护江青等人的讲话，立即组织起来，是为“四·三派”。

五月

5月3日，下午全校大会，谭厚兰讲下段运动计划。

5月4日，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到师大，接见师大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和部分革命师生，听取汇报并对师大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号召全校师生对师范教育的改革展开大胆、广泛的讨论，并建议师大在教改中写出两本书：《世界教育制度发展史》和《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

5月5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报道。报道说，炮五师在北师大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

毛对这篇报道有批语：

文革小组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

毛泽东 五月七日

5月16日，外语学院贴出题为《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同一时期在钢院、师大、农大、商学院、二外等学校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同日，《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之际，《文化革命简报》470期上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此文是对谭讨孔、反“二月逆流”的重奖。谭厚兰成为“左派”领袖，造反兵团成为“瓦解了”的“保守组织”。

5月17日，王颂平以“斗陶兵团”的名义，贴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小人物”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大人物”》等大字报。王颂平和谭厚兰彻底分裂。方延曦编写了《北师大路线斗争概况》说：“由于当时校内已经形成了‘反对林杰、关锋就是反革命’的舆论，整个形势很不明确，因此姑隐其名，取名‘斗陶兵团’。”

5月29日下午、晚上，校革委会召开全校大会，谭厚兰讲话，宣布在教二楼发现一张矛头直指总理的反动标语。规定三天之内不准出进，停止一切工作抓反革命。

5月31日晚上，王颂平“斗陶兵团”开会，王颂平讲了一件事，中文系一谭派骨干，白天突然在办公楼摔死。她肯定，是“杀人灭口”。她亲眼看见，一辆轿车驶入师大，下车的是康生，后那辆轿车悄然离去。她肯定，是找谭厚兰密谈。她分析，谭厚兰可能对斗陶兵团下毒手。要我们这几天都到这里来，防止谭厚兰来破坏。最后，她说，为防止不测，明确一下“斗陶兵团”成员，干脆写在黑板上面。她念我写：“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丁青元、马丽华、李国元”，只写了出身“红五类”的。出身有问题的，都不写。这样写，纯粹是为了防止对方抓出身不好的辫子。

△5月，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报与首都“电影革联”在《电影战报》合刊上发表了《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全文约七万字，批判十七年生产的电影及电影管理体制。

△5月，文化部、中宣部、学部及首都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联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

六月

6月2日晚，师大革委会委员、数学系“井冈山”的头头李竞权率领一伙人，收回“斗陶兵团”仅有的一间教室。“斗陶兵团”搬到工五楼。

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这篇著作。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的通知，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集中力量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首都工代会、红代会召开纪念会。谢富治在会上指出：前段社会上两大派的对立，妨碍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给外省市的运动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两大派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搞大批判。

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五大组织在会上联合发言，人民大学的“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北京师院的“东方红”和“井冈山”等也作了联合发言，表示要消除分歧，团结起来。

6月30日到7月1日，北京钢院学生张建旗串连农大、师大、商学院、101中学的一些人在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五一六”兵团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周恩来的活动。8月下旬，“五一六”兵团被取缔，其骨干分子均被逮捕。

△6月，北航、地院、师大等院校，出现“斗、批、改”的新气象。北航斗批改办公室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治我们学校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抗大经验；半工半读；1961年至1963年教育战线出现大反复等情况。25日开始，开展文艺大批判活动，先后把《林家铺子》、《两家人》、《武训传》、《青春之歌》等毒草影片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揪出来示众，组织大批大字报上街。

地院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5·16通知后，“东方红”《揭竿而起》战斗队写出了一篇轰动全院的大字报《谁是我院最大的危险？》，掀起了一场全院规模的大辩论。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十七年来地院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教育路线、科研路线等到底属于那个司令部的？究竟怎样才能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院的影响？院

系各级如何互相配合搞好院内斗、批、改？如何对待干部？辩论气氛十分活跃，斗批改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师大校园内一片新气象，出现了“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大方向的人越来越多，批刘、邓的人越来越多，搞斗、批、改的人越来越多，上街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打内战的大字报越来越少了。常委会计划在六月份掀起教改的新高潮。主要内容有：批判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编写《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编写教育战线十七年来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记；毛主席关于教育的语录等等。

七月

7月14日，北师大开始复课闹革命。

7月21日下午3时，戚本禹电话发出紧急动员令：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马上开始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拟定类似这样的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蛋！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等。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进行。马上搞示威游行，经过天安门，时间由现在开始，搞二天到三天（红代会通知：标语口号不得出现王力、谢富治的名字）。根据这一布置，全市集会游行蜂起，并连夜波及全国各地。

《动态报》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海陆空三军、炮兵、二炮、工程兵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十一晚全部出动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二十一日下午，北大、清华、北航、师大、地院、矿院、体院等高等院校均发出紧急动员令，并立即出动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冒雨进行。”

“北航约六千人参加了游行，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武汉钢工总、钢二司等造反派。”“北师大全校开大会，向武汉三钢等造反派组织发出声援电，会后六千人参加了游行。”

7月25日下午，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民院“东方红”、京工“东方红”、财金八八、工人“东方红”等单位同学到京西宾馆揪陈再道。谢副总理知道后打电话指出：揪斗陈再道是革命行功。

八月

8月10日，十时全校广播通知明天批斗彭德怀。

8月11日，晚批彭德怀大会。

8月14日，根据中央文革“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的指示精神，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成立“专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团联络站”。

8月16日，根据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北航举行“武装北航红旗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8月18日，师大“井冈山”也举行了授枪大会。

8月21日，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斗余秋里誓师大会”，并成立了“揪余火线指挥部”。

8月22日，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成立的反帝修联络站，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制造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谭厚兰率“井冈山公社”参与。

8月23日，陈伯达、姚文元、戚本禹到《红旗》编辑部，召集会议，由陈伯达主持，戚本禹宣布文件：王力、关锋自即日起停止工作。

中央文革办事组特急电告重庆警备司令部及各群众组织。要求立即制止正在升级的严重武斗，做到立即停止射击与包围；绝对禁止向解放军射击；立即达成停火协议。

在《解放军报》社工作的萧力等三人在报社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揭批社长赵易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赵易亚家。

八机部、交通部、邮电部、经委、工交政治部等四十余单位批斗薄一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向大专院校发出号召，谢富治要求大家认清大好形势，认真学习毛著，不要外出串连，不要打“内战”，要联合起来有计划地搞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大破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建立毛泽东思想的新教育制度。

8月26日，北京及全国1000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5名常委被揪斗。

8月31日晚召开斗罗瑞卿大会。

△北师大共有东、西两个操场，这些活动都在东操场举行。东操场中间是个正规的足球场，四周是400米跑道，共有两个主席台，一个在西侧，一个在北端。斗彭德怀是晚上在西侧的主席台上。而斗彭真等一大批人是白天，在北端那个主席台上。斗罗瑞卿是用箩筐抬出来的。我记得斗罗瑞卿是与斗彭真等是在一起的，因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是连在一起的，统称彭、陆、罗、杨。把他们四人搞在一起批斗是顺理成章的。在我脑中那次还同时斗了很多人，好像北京市委刘仁、郑天翔、万里一大帮都在里面，好像还有薄一波，还有我校党委书记程今吾，因为程是从中宣部调来的，说是陆定一安插的亲信。我记得斗彭德怀与罗瑞卿是分开的，但蔡鸣乔坚持说在同一天，这只能再问问别人或查有关资料再作最后定夺。（赵惠中2016-2-16来信提供）

△8月《红色批判者》、《新闻战线》出版“雷锋专号”联合版，发表北师大“井冈山”学雷锋战斗队《揭开篡改〈雷锋日记〉的黑幕》，《中国青年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从学习雷锋运动看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国少年报》“反到底战斗队”《不许用刘邓黑货毒害少年儿童》等文章。

△8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影协革命造反委员会《中国赫鲁晓夫在电影领域中的投降主义罪行》；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北师大“井冈山”中联“奔腾急”战斗队、北师大“东方红”鲁迅兵团《〈煤城春秋〉是吹捧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毒草》（《煤城春秋》

是在电影《燎原》基础上写成的长篇小说，尚未出版，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两幅篡改历史的黑画》（批判油画《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和表现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时传祥在一起的素描《同志》）。

△8月 谭厚兰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到处揪军内一小撮，积极参与揪刘火线，影响广泛。

△王、关被审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荡。在北京造反派中与王、关牵连较多的是“地派”，而“天派”中的一些人则早就开始对王、关有所怀疑。8月31日夜，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几百人冲击光明日报社，与报社部分职工发生武斗。9月1日中午，报社造反派和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将穆欣绑架。周恩来在接到报社职工报告后，责令将穆欣释放。（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九月

9月1日晚 谭厚兰在革委会会议上坚持说“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同日 北航“红旗”、北石“大庆公社”等组织在师大校园里贴出“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拾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9月2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天派”各校代表在矿院开会，北师大“造反兵团”勤务员王颂平派代表参加，与会者听北师大“造反兵团”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还散发了恢复活动的声明。“天派”给造反兵团一套广播器材，决定在召开庆祝大会时，以体院为主保卫主席台。

同日，穆欣向周恩来写信，报告了自己被绑架的经过，提到造反派向他提的问题：“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吗？你从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么地方开过会？见过什么人？同什么人打过电话？”“你同红旗杂志什么人联系？你同林杰是什么关系？”……由此可知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信息是多么的灵通，8月30日王、关被隔离审查，第二天他们就探出了风声。（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9月3日，在《红旗》杂志社实习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痛哭失声：“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当晚，蒯大富、韩爱晶到师大看大字报，并用钢笔在大字报上写下：“坚决支持真正的‘井冈山人’”等文字。

同日下午，王乃英去师大找到谭厚兰，王交代：“二日下午和三日下午，谭厚兰给我讲了很多话，我给她讲了林杰七八月份情绪一直很不好，老说阶级斗争复杂，说不知穆欣是什么人，不知吴传启的历史，说斗争要有反复等。我给她讲了，林杰关于江青同志、康老、戚本禹同志所说过的一些话。”

9月4日，谭厚兰召开全校大会，动员群众去《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

9月5日，师大35人发表了“关于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签名的有师大革委会三个常委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革委会委员和各系“井冈山”大队负责人。当晚，王颂平主持会议，分析形势，决定恢复造反兵团，召开恢复庆祝大会，邀请“天派”参加。庆祝大会由夏晓阳主持，王颂平讲话。

同日，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反谭厚兰的小组织。因为谭得到中央有力支持，

并建立了合法的革命委员会，“井冈山造反兵团”早就停止活动了，谭厚兰与林杰、关锋既有工作联系，又可看做师徒关系。这回林杰关锋被打倒，“井冈山造反兵团”乘机想恢复活动，与谭对着干。负责人王颂平和钱崇光去北航寻求韩爱晶的支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页308）

9月6日晚，蒯大富、韩爱晶以及体院、轻工、矿院、机械学院许多高校天派头头在北航开会，大会的名称为“打倒林杰，砸烂反动组织5·16兵团，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王颂平、铁崇光也参加了会议。先由王颂平介绍师大情况。蒯大富、韩爱晶决定：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会上，王颂平、韩爱晶共同研究了策略和口号。王颂平提出第二天大会上喊“谭厚兰靠边站！”韩爱晶说：“谭是打不倒的，要提‘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如果她检查反总理就够了。如果不检查，就没完。”蒯大富把黄家林、樊立跃、申家兴从师大叫来了，一起进行策划。会议到深夜两点多才散。蒯大富派小汽车送黄、樊、申家兴、王颂平、铁崇光回校。

9月7日早晨8点左右，“专政委员会”在“7·27广场”召开批斗谭厚兰大会。10点左右，“天派”来了上万人，参加“打倒林杰，彻底摧毁5·16兵团誓师大会”和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韩爱晶亲临北师大（一说他俩在北京电影学院幕后指挥）师大“井冈山”几十个战斗队集体加入“造反兵团”。

7日晚七点左右，中央文革小组紧急通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一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1967年9月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随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指示：（1）北师大的革命委

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的组织。谭厚兰是革命的，如有错误可以进行批评与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与“井冈山”的革命组织，不准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属于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亦发通告：（1）北京师范大学，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下，擅自推翻师大的革命委员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违反中央六六通令，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的，现宣布无效，并立即恢复原来的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全三人拘留审查。此命令通报全市各革命组织。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在讲话中还说：“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消息刚宣布，“地派”到北师大游行声援谭厚兰。“9.7”一日，上午“天派”、晚上“地派”，来北师大的人数高达10万人次。当晚，谭厚兰在“7·27广场”召开大会，拥护中央文革紧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声讨“专政委员会”罪行。并说造反兵团是“一月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

△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师大“九七事件”作出的反应是迅速的，坚决而有力的。王力、关锋被停职反省后，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恐怕人们对王、关二人的批判会波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和整个小组，一直对此事保密。“九七事件”发生时，“打倒林杰”的大标语已公开在北京街头张贴，如不及时制止，势必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批判王力、关锋等人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愿意看到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为打倒谭震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师大“井冈山”就此垮台，师大“井冈山”的垮台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反击二月逆流”的重新评价。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9月9日 谭厚兰召开大会，宣布“九七事件”为反革命事件。

9月17日，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说：“中央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很多事情，你们不应当知道。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你们还去乱搞。我们有的事情要封锁到最小的范围。”（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

9月23日，清华团派、四一四负责人开会商讨联合总部人选问题，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促进双方尽快大联合。（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9月25日，《解放军文艺》第15期出版，发表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外教批修战斗组《把肖洛霍夫捉来示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诗选》（《望北方》、《收下吧，解放军同志》、《放开我，妈妈》、《孩子，去吧》四首）。同时发表的还有南京部队某部党委会《取消武装斗争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对革命人民的大叛卖》，《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专栏（包括晓角、投枪《〈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修养〉》，装甲兵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五洲红《评陶铸的〈风格〉》，肖学声《看！陶铸的叛徒面目》，“新北大”公社“万里长城”《砸烂陶铸的“功德碑”——批判〈小城春秋〉》），柳丙仁《米脂红旗》（散文，写米脂县人武部政委崔孝堂率部支持米脂中学101为首的造反派的事迹）等。

年底，66、67、68 三届学生要毕业，因对分配方案有意见，造反兵团在主楼静坐。并发生激烈辩论。■

附录：

北京师大红卫兵小报简目

选自李晓航编录《北京小报与期刊目录》

载《昨天》2016年4月30日第68期

师大战报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革命筹委会校刊编辑部

兵团红旗 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1967年创刊。4开。铅印

讨孔战报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井冈山战斗兵团

井冈山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1966年12月9日创刊。4开。铅印

斗批改通讯 北师大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通讯组

井冈山通讯 北京师大革委会对外作战部。8开。铅印

工学战报 新师大红革会革命造反队

火海战报 新师大中五《32111》战斗组

挺进战报 新师大化学系“奇异”、“挺进”、“红卫”战斗组

钢一连 红代会北京师大钢一连编辑部。4开。手刻油印

险峰战报 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险峰战斗队。4开。手刻油印

红旗战报 北京师大井冈山。8开。手刻油印

挺进报 北京师大中文系“挺进”战斗队。1966年创刊。8开。手刻油印■

【资料】

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1966.07.16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办公室主任闻师功的职务。因为孙友渔，没有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害怕民主，压

制民主，拒绝革命同志的批评，打击了革命群众，把锋芒转向革命同学。

六月廿日早六点，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志贴出一张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这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孙友渔同志没有听取批评，检查自己工作组中的缺点，错误，反而把这些同学和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使这些同学受到委屈，实际上是压制民主，拒绝批评。廿二日¹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正确的。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对这张大字报仍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使谭厚兰同志同样受到委屈，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检讨。

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革命的同志，这是非法的，上级指出后仍然没有改。今天我指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有一些同学在孙友渔的蒙蔽下，围攻另一部分同学，这两部分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发生这种不正当的事情，责任不在这些同学身上。还有些同学是受孙友渔错误思想，错误办法的影响，把他们当作党的领导。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责任应由孙友渔来负。我们的工作组不管来的人职位多高，官多大，都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工作组有毛病，都是可以批评的。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拥护，不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反对。我们同学有责任提出意见，甚至罢他的官。即使我们新市委在工作中也常出错误，同学发现了也可以批评指出。孙友渔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中央很关心文化大革命，也关心师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十三号²知道后就找师大工作组主要负责同志去汇报，汇报后指出了他的错误。回来后孙友渔思想搞不通，不肯承认错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一直到现在对一些同学的压迫还没有解除，这就是错上加错。过去，市委也曾对孙友渔的这些做法提出了意见，六月二十八日找孙友渔谈过话，指出问题所在，提出了市委的意见。孙友渔表面接受，实际上并不传达下去，按新市委的指示把这件事办好，而且还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用工作组名义给市委及康生同

¹ 据赵惠中先生考证，吴德这里所说的“廿二日”，应该是23日。

² (据赵惠中先生考证，这个13号不可能是6月13号，只能是7月13号，吴德的讲话不能在此之前。)

志写信，其他一些工作组成员都不知道。根据以上理由，决定撤除孙友渔工作组组长职务，决定刘作级¹为工作组党委书记兼组长。

总之，市委是坚决支持同学革命的。让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因贴大字报而受压迫的同学解放出来，把受孙友渔错误思想影响的同学解放出来。让我们两部分同学携起手来，向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同学们！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

【资料】

李雪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1966. 07. 27

同志们、同学们：

我同意康生、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应按他们的意见办事情，下边我按同志们提出精兵简政的原则，说几句话。

一些人受了迫害，一些同志受蒙蔽，被欺骗（大意），我代表新市委向受迫害的革命同志道歉，向受蒙骗、被欺骗的同学致以歉意。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派了一个右派的工作组，他们是新市委派来的，当时新市委刚刚成立，缺人手，四处求援。他们是我们请来的，

¹ 赵惠中先生认为，“刘作级”，应为“刘卓甫”。

我们派错了，请错了，这些都由新市委负责。

孙友渔的问题，康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让他立即改正，他拒不接受……（有句话没听清）请同志们检查批评，你们是主人，可以批评任何人，我们新市委欢迎你们批评……凡是混蛋，都应该罢官，你们什么时候下令罢，我们就什么时候罢，罢他的官是容易的。现在是清算他们修正主义恶毒影响的问题。（指孙）的情况，我还了解的，什么时候放他们走，请同志们决定。受迫害的一方面我看过了。你们说得对，有一些人是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只要清醒过来就是好的。刚才有些同志作了检查，这种态度是好的，有错误就检查是共产党人的态度。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你们，错误就在于工作组（大意），以后怎么办？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干革命不能要保姆，自己起来闹革命，这里边一定有人材。把文革进行到底，谁也挡不住，由你自己来干，以后同学们需要我们来，我们也召之即来，什么时候叫，就什么时候来。■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2009。

【资料】

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1966. 07. 27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吗？（众：好！）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所有成员到你们师大来，（欢呼）向你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跟你们学习，并且向你们问好！（鼓掌）我受毛主席的委托，

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众：毛主席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同志们，好多同学递条子来，要我们介绍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现在我就来介绍。（以下逐一介绍小组成员）

同志们，同学们，今天，我们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全都来了，听到师大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辩论进行得很热烈。因此，我们想跟同志们来学习，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先生，因此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把意见告诉我们。

首先，师大斗黑帮分子，斗程今吾，斗得很好！（众：打倒程今吾！）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众：打倒程今吾！）但是，对程今吾的斗争还没有彻底，是刚刚开始。以后工作组派人来了，派来的是以孙友渔（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你们这儿来。我们经过调查，孙友渔这个组长是没有声誉的。他到你们学校之后，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同学。有的同志问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你们的调查是不是很全面，是不是抓住了关键问题，孙友渔在师大做的工作是好还是不好？同志们希望我们调查，我答复：我们是经过详细、周密、彻底调查研究的。（欢呼）

我只举一事实：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后，北大用大字报揪出来的，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的王运良同志，在六月二十日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这张大字报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但是这张大字报被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要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复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

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你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打倒孙友渔！）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应该！）同志们！我还要和同志们讲一件事，孙友渔反党活动中，他们不是去反对彭真黑帮，而是把矛头指向我们《红旗》杂志的左派林杰同志，你们看，我把林杰带来了，（鼓掌）同学们！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热烈鼓掌）这是个好学生，你们的一个好同学！（热烈鼓掌）但是被孙友渔别有用心地说“林杰支持右派学生！”还有人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个后台老板是我呢！今天我要问一问你们：看我是不是黑帮？（不是！）算不算黑线？（不算！）……

文化大革命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斗争，另一个方面改革。斗争混在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权派。斗争他们的时候，就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权威”。这个斗争大概就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也许连在一起斗，也许分开来斗。以后就要改革，教育革命，教学改革，学制怎么办？实现毛主席的办学方针怎么办？和工人、农民、解放军如何来结合？到底课程、专业怎么办？到底我们的教材谁来编写？教科书什么内容？一系列教学教材的改革，学制的改革等在我们的后头。所以我们要先破后立，后立也要破，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这个轮廓，这个轮廓请同志们想一想，要依靠什么力量？（有关师大革命要依靠师大师生员工的话，略）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的脑子里破除迷信，提高觉悟，自觉革命，肃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相信自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你们能够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深，搞得透，一直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江青同志讲话

师大的革命同学们，革命的教职员们：

我们今天来，也受毛主席的委托，问候你们好！同学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没有很多意见讲，因为我们应该先来做小学生，了解情况，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接到许多同志的条子，有一些意见我觉得是好的。你们已经是大学生了，至少十八九岁了。我们这些同志都是十八九岁就闹革命的，有的还小呢！十五六岁。那时有国民党的压迫，我们就没有被国民党什么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还是干起革命来了。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你们难道就不能自己革命吗？你们难道还是幼儿园的小孩子吗？还要阿姨叔叔吗？要这样顺从吗？我相信许多同志是被蒙蔽的，斗争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这是错误的。党中央、毛主席向来是相信革命青年的。你们现在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已经是大好的。

你们已经接受了一些考验，但还不够。你们有些人还想要保姆，保姆还是好的，保姆还出于爱护小孩子。现在我们的工作组是石头，阻挡你们前进的道路。革命是不能叫别人来包办代替的，要靠自己自觉，自己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认为自己是老革命，革命要看他一生，同时还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如何表现。陈独秀曾经是党的领袖，后来成了党的叛徒。因此，老革命，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中也要象小学生那样虚心学习，向群众学习，也要改造，进行革命。你们要求撤销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工作组也不一定是坏人，有一些是好同志，到了群众面前束手无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来打击你们，迫害你们，这是有罪的要检查交待。

我们建议你们自己组织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甚至全校代表大会，可以充分酝酿讨论选举出来后，经过斗争的考验，搞不好，再罢他的官；好的，我们就跟他一起革命，这里没有折衷主义。但是工作队孙友渔，包括刘卓甫这样的工作队，在同学中造成分裂。因

此，我希望那些受了迫害的同学应当原谅那些被蒙蔽、被欺骗的人。经过斗争考验，才能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那些被欺骗、被蒙蔽的人，做了不好事情的人，也应该想想，也应该交待（指工作组的），然后才能站到革命这边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才有利于打倒一小撮黑帮、修正主义、地富反坏右。

今天我只讲这一些，供革命同学、革命教职工参考。我们的意见不对就写大字报。我还是这样说：革命的跟我们一起来，不革命的走开。不要怕乱，乱和治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乱哪来的治？不受迫害，你们怎么知道革命的困难呢？多受点迫害，能挺得住，将来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我们相信你们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不要把我们的青年教成象小特务一样，我看见许多这样的材料，这是犯罪的。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对自己人盯梢、监视干什么？我们公安部队不是这样工作的，是走群众路线，为什么闹革命不依靠广大群众？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同学？希望同学们不要害怕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我的话今天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事，什么意见？我讲的是给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职工听的。反革命的他们也可以来听，让他们靠边站着。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有关师大的具体问题，略）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讲话，提出来的主要是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文化革命工作组是从上面派下来的，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包办代替的方式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建议撤销工作组，好吗？革命必须自己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向你们建议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总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作为你们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不要搞保姆，你们长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不能做保姆。他要当保姆也要先学习，先当学生，没学习过就不能当保姆。你们学校来了两个工作组了，

孙友渔的工作组搞得很坏，没有孙友渔的孙友渔工作组，就是刘卓甫工作组，也搞得不好。是否还要第三个工作组？自己管理自己，我看可以搞好的。将来有些具体问题可以帮助解决。有些事情同志们是关心的。例如档案、技术资料、武器问题。这些，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拟出一个管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档案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道理的。现在来查这些人的出身，这些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过去干了些什么事。修正主义者有它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的陆平黑帮，你可以把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列一张表出来就可以清楚了，原来是这些人在这里掌权。为什么陆平这个黑帮要排挤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照顾地、富、反、坏、右子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所以，查黑帮的档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档案要有一定的手续，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可以订出条例，按照正确的手续、条例查档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要保管好，不要随便动。你们搞思想革命，搞脑袋里的革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命，革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命。你们一定有好多事要做，比如饮食，现在大师傅做饭，你们满意吗？（满意！）在文化革命小组下，你们可以成立生活小组或者生活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生活的事。

工作组有一些好的、比较好的，这些不是都不可信任。要吸收前两届工作组的经验教训。犯了错误，他们被轰走，这是完全对的。他们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因为有固定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习惯、剥削阶级势力，在他们脑袋里盘旋着。除此之外，有些是好人，有些是比较好的人，有些是犯错误的人，还有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但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根本的错误是想当保姆，又不想学习，不当学生。刚才江青同志说过，你们不要保姆，运动可以进行得更快些，更健康些。他们没执行毛主席的工作的根本方法，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他们学生不当，你们说一句话，就打到底下了。这种人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做文化革命工作，一定要失败，你们轰的完全正确。你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也有可能走他们的路子。任何人当了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当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当了文化革命代表会

议的代表，都要非常警惕，要好好地学习，很好地当群众的学生，当群众的勤务员。如果认为当了委员、当了代表就高人一等，也会失败的。有的学校工作组撤销了以后，已经成立了临时委员会来筹备选举工作，我看是个好方法，你们可以考虑。过去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是不是预先指定的？现在要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酝酿多少次、多少天，完全由群众决定。提出候选人名单由大家讨论，这个人合适不合适，能不能当，有没有代表性。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不要宣传清一色，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以革命的左派、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核心，也要让旁的人参加，这样才能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才能够争取犯过错误的人、动摇不定的人。这样我的话就完了，没有话说了。

所有过去指定的那些组织，现在一律重新改选。原来的工作组还要留下，因为他们没有当好你们的学生，要受教育，让他们留在这里补课。因为他们一来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他们来了就要当先生，瞎指挥，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也不懂，很可悲。凡是不能当群众学生的人，永远不能当群众的先生。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跟党的关系。是不是成立这些组织，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同学们都知道，过去列宁讲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呢？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我们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没有说不要党的领导。正是在制定宪法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讲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党中央的领导，不能说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党员都能代表党的领导。在这次文化革命中不是有的党组织瘫痪了吗？一些党员不是要不得吗？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党的组织，是不是能够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员，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组织。是不是象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真正当群众的学生，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是这样的党员，每个人就能在文化革命中起一定的作用，党的组织就能起领导作用。如果不是这

样，就不能起作用。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在文化革命中应当成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

同志们，有许多党员不是反映群众意见，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这样的党员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党员是坏党员，终究要被党开除出去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根本标志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如果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共产党的组织，没按毛主席讲的去，违背党的三大作风，就要批评，给他提意见，如果不接受，就可以告他们。我过去在乡下的时候，见到有这样的干部，他当了干部就像高人一等。老百姓说：“他们是父母官，我们怎么能批评呢？”我就给他们说，现在革命了，解放了，无产阶级专政了，翻了身了，已经是社会主义时代了，过去把当官的比作民之父母，民为之子，现在相反了，共产党员、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儿子，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员的母亲。有些农民觉得很可笑，说过去怎么没听说过？我说过去没听说，现在我给你们说一下。现在我也给你们再说一下：我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差不多了，讲得差不多了。■

来源：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11）；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讲话（选编）》（第一集）。

【资料】

康生接见部分学校来访学生时的谈话

1966.07.28

各校有不同的问题。你们所关心的工作组的问题。我们到过广播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这三个学校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革命师生和市委宣布两个建议：

一，撤销工作组，二，革命的师生自己在各校组织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和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两个建议是真的，不是假的。

中央有两个考虑：我们认为为了更好的放手发动群众，为了更好地使革命师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使革命师生的高度热情更好地发挥出来，自觉革命，更好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好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斗争，以便将来更好地改革教学制度进行教学革命和教学改革。

派工作组的方法，两个月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中国文化革命的目的。所以，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都应撤销。

六月一日，中央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把北京和以彭真为首的黑帮的盖子一下子揭开了。因此，北京各校的革命运动就一下子爆发起来了，有许多学校的党委都垮台了。各校向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去。当时，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来看，要派工作组，北京市委就从各地抽调干部，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刚到学校，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你们不都干过吗？但是，从两个月的经验看起来，这个方法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斗争，一个是改革。斗争，有的学校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学校合并起来，有的学校先斗当权派，再斗学术权威。例如：北大先斗陆平、彭珮云，然后就要轮到斗翦伯赞、冯定、冯友兰；下步就是教学革命。包括教材、教学。重要的教材研究，半工半读等等都要解决。现在看来，北京工作大概是这个情况：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不坏的；有的是坏的。有一个时候，我们看到如师范大学，地质学院，林学院，广播学院等很多学院不斗黑帮。“六·一八”、“六·二零”事件后，反过来斗了学生，斗了第一批贴大字报的学生。清华也是如

此。

北大没有斗聂元梓，但长期以来冷冷清清。这不是革命运动。这里有几种情况：工作组仓促进学校，有的一下火车就进学校了，有的连文件也没看，对学校也不了解，文化革命也没有搞过。他们也毫无准备，毫无知识，就去了。这不能全怨他们，他们对学校不认识。工作人员复杂，有左的，中的，右的，里面也可能有回本单位就挨斗的。这样的队伍是不能作战的。他们都有很大的缺点，就是怕乱。

北大“六·一八”本来是群众的革命运动，虽有个别缺点，但是好的，是革命的。但工作组就慌了手脚，把它说成是反革命事件，以后就把工作搞得冷冷清清。这个班跟那个班，这个系跟那个系，不能发生关系。门岗层层，这样是不能革命的。害怕群众，就是害怕革命。“六·一八”等事件本来是革命的，就是认为不是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所以后来就来了个消除干扰，结果把黑帮丢了，把你们学生斗了。这证明有些工作组不领导革命，而是去阻碍革命的。北大是如此，师大更厉害，西安交通大学也是如此。工作组一去，人家敲锣打鼓欢迎，但是工作组搞得不好，人家贴大字报，他们就说夺权，是反革命，就打击左派，整学生。

另外一方面，斗黑帮是工作组清楚呢？还是不清楚？（钢院有同学插话，康老答）钢铁学院有工作组吧？是他们了解情况呢？还是你们了解情况？将来斗学术权威是你们有力量呢？还是工作组有力量？要叫我斗钢院的权威，我只好干瞪眼。我没有认识嘛！让张承先斗翦伯赞吗？他连翦伯赞的书都没有看过！这样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成由工作组包办代替。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必须由群众自己来搞。自己来革命。所以，工作组代替就不是从群众中来，不是当小学生，而是站在群众之上。我们有的干部都习惯坐机关，坐办公室。我们有些学校的工作组像保姆一样，你们搞革命还要有保姆来看管？保姆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就看一看，坏的就打小孩。所以，派工作组是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很多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不对头的，应该改，要撤出工作组。

撤销以后怎么办呢？就要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因为群众是主人，群

众能够做好，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大多数学院是斗垮了黑帮，工作组才进去的。根据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要让广大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革命，革命的同学和老师是主力，要动员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能完成教学改革，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倡议：各校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全校要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还可以有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要由师生自己选举，充分酝酿，充分议论。不充分酝酿，不充分议论，就不选，就可以重新选，不好的就可以罢他们的官。经过几天的酝酿，把候选人提出来，把名单贴出来，再进行选举。因此，当工作组撤退就可以采取过渡办法，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上级机关只派巡视员，观察员在旁边帮助，这样的人很少。

毛主席说过，文化革命委员会，要有广泛的代表性，革命左派要善于团结广大群众，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你们读过《九评》吧？你们看看第三条，这条是左派的标准，左派要善于团结大多数人，不要孤立自己。（有人提问，康老说）我告诉你们，你们选出来的也不是铁板一块，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有的你今天看不出来，将来遇到一个事，就可以看出来了。（有人提问，康老答）工作组提了候选人不算数，可以不选，你们是主人，你们自己来选。

有的学校不敢开大会，开万人大会的实际还没有。找个教室，几面又拉上线，同学见不到发言人，发言人见不到同学，这是不行的。工作组作主不算数，即使选出来了也不算，你们坚决反对！中央的方针是：你们自己提名单，自己选举。你们什么时候想选，就什么时候选，工作组算老几！■

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内部资料，仅供参考），北京汽车分公司文革大字报办公室、北京汽车分公司行政保卫文革、北京国棉三厂文革筹委会宣传组，1966年11月12日。

【读者来信】

1. 周一云、王伟赞乔晞华的《文革暴力、真相与和解》一文

乔老师的研究对国内的文革学界有很大帮助。记得那年陈小鲁和宋彬彬道歉，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公知”都著文发声，狠批道歉者。南方系列的报刊本来想组织相关文章，结果人人吓得不敢说话。惟恐被公知扣上反攻倒算的帽子。如果这些真理在握的公知们看到乔老师的文章，大概就会明智些了吧？向乔老师致敬！

——南方日报 王伟

2. 郑平平、刘葳谈《宇清谈画》

《宇清谈画》这个栏目设计得很好。文革不只是政治革命，还是思想的革命，文化的革命，后者包括中国人的审美口味的革命。思想文化的改变，文艺观、审美口味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五一六通知”下来才改变的。这种改变的基础是执政党“兴无灭资”和“大众文化”理念的确立，是执政党宣传方针的调整。王宇清先生告诉我们，什么画可以画，什么不可以画。揭示一个隐藏了很久的秘密——中国人的审美口味为什么会改变，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杭州美院 郑平平

王宇清老师一定是身兼两职，既是张贴画的收藏家，又是宣传艺术的研究者。我知道《记忆》是当下难得的好刊物，但是，说老实话，我一看那些论文就犯困。王老师的文章则不然，图文并茂。为他点赞！提一个请求：能不能再深入一点？现在有点浅入浅出。

——广州 刘葳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辑：梨洲

本期校对：立新